

迦太基政制研究

王京阳

摘要 | 迦太基是腓尼基城邦推罗在公元前814年于北非建立的殖民地，作为推罗的子城，它在政治、宗教和商贸等方面深受推罗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迦太基的整个历史进程。迦太基在建城后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很有可能实行君主制。公元前6世纪之后迦太基以共和政体的形式存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灭亡。在这段时间，迦太基政体主要是由代表王制因素的苏菲特，代表贵族制因素的长老院、五长老团、将军、一百零四人院和代表民主因素的公民大会组成。这几个机构相互配合、彼此制约，维系着迦太基政制的平稳发展。作为殖民国家，迦太基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开始向海外扩张，并相继在西西里岛西部、撒丁岛、北非和西班牙南部建立殖民地。在迦太基的统治下，殖民地沿袭旧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需要履行交纳贡赋、提供战时的弹药、兵丁和补给等义务。迦太基对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追求远超政治目的，因而在殖民地建立统一的制度，与殖民地之间更像是松散的利益联盟。虽然迦太基和罗马、斯巴达一样，都属于共和政体，但迦太基政制与罗马、斯巴达政制呈现出迥乎不同的特点。与罗马和斯巴达相比，迦太基政治被金钱所操控，它的城邦政治被少数富商大贾所掌握，因此迦太基政制呈现出明显的寡头政治色彩。在这种政制之下，寡头集团内部的斗争与分裂，深刻影响了迦太基后期的政治走向，制衡性、稳定性和二元的政制结构成为迦太基政制的主要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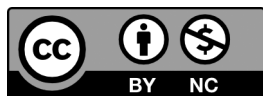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腓尼基；海外殖民；迦太基政制；共和政体

作者简介 | 王京阳，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综合执法局九级科员。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民主共和政治是古代世界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产之一。共和一词出自拉丁文 *res publica*（共和国），原意为公众的事物、公众的财产，后来逐渐演化，在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著作中已有“国家”的意义，但在西塞罗时代共和国概念尚在形成过程中，含义比较模糊，基本等同于城市国家，而

与近代沿用至今的共和国概念有所不同。^[1]按照西塞罗的说法，共和国包括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普通政体，换句话说，共和国既可实行君主

[1]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制，也可以实行贵族制，还可以实行民主制。西塞罗特别强调，共和国除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普通政体之外，还有一种兼备上述三种普通政体成分因素的混合政体，即共和政体，罗马政体就是其中的典范。共和政体是古罗马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国家形式，其政体的优越性受到历代称赞。但应该注意到，虽然共和国以罗马共和制为历史典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制与共和思想是罗马独有，也不意味着古代的民主和共和仅限于古希腊罗马地区，许多国家都留存了民主和共和的历史痕迹，不能单纯地把古代西方当作民主和共和的发源地。斯巴达和迦太基以及和斯巴达政制相似的克里特，也被希腊思想家列为共和政体的历史例证，其政制兼备多种政体要素。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在古代国家中虽属少数，但他们在人类历史特别是政治制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它们的共和政体既存在共性，又有差别，并不完全相同。迦太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这有助于更加清晰地显现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些特征。

一、迦太基政制的历史来源与早期建构

迦太基是腓尼基城邦推罗在公元前 814 年于北非建立的殖民地，到公元前 6 世纪左右，迦太基才摆脱推罗的钳制。迦太基作为推罗的子城，它在政治、宗教和商贸等方面深受推罗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迦太基的整个历史进程。迦太基凭借推罗发达的航海技术、海上商业贸易、海外殖民地和海上航线，奠定了商业发展的先天基础和商业国家属性；迦太基早期承袭了推罗的君主制传统，奠定了后期迦太基政制中的王制因素基础；迦太基继承了推罗的宗教信仰并将其带到殖民地广泛推行，维系着迦太基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了解腓尼基人的政制和发展模式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迦太基的历史来源和早期政制建构，有助于更加完整地理解迦太基政制。

（一）作为迦太基母国的腓尼基政制

1. 腓尼基的城市国家

古代腓尼基人被赋予许多荣耀的头衔，因为发达的商业贸易，有人将腓尼基人称为地中海世界的海上马车夫，马克思更是称其为优秀的海上商业民族，不可置疑的是，古代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有着相

当大的影响力。实际上，腓尼基既不是地理单位也不是政治单位，而是沿着叙利亚—巴勒斯坦狭长海岸线分布的一连串城市，以西顿和推罗最为出名。腓尼基西方毗邻地中海，东方环绕险峻的黎巴嫩山脉，南方与巴勒斯坦相邻，北方接壤小亚细亚，其地理范围大部分与今天的黎巴嫩领土重合。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前 3000 年代末至公元前 2000 年代初，一群说着塞姆语的迦南人迁入地中海东岸定居并与当地的叙利亚人、希伯来人 and 非力斯丁人形成混居的局面，这便是腓尼基人的先民。

腓尼基以商贸、航海和殖民著称。商业十分发达，具有十分典型的居间性质，即他们在出售本城邦产品的同时，还转卖来自其他城邦的货物，如腓尼基人将来自小亚细亚的农产品转卖到地中海沿岸地区以赚取利润。^[1] 腓尼基各城邦居民多从事工商业，奢侈品制造和金属制造业尤其发达，从贝类软体动物身上提取的紫红色颜料更是腓尼基的标志性商品。值得一提的是，腓尼基的海陆贸易十分繁荣，腓尼基人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不断地扩展新航路和增加贸易的内容，在希腊城邦的手工业发展起来之前，曾独步地中海沿岸。腓尼基商业发展到强盛时，其商业扩展至周边的各个地区，十分繁荣兴盛。

繁荣的商贸活动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引起了强敌们的觊觎，这导致腓尼基大部分时期内并不享有完全的独立地位，其自治权力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受限于领主国家。腓尼基自诞生之初（公元前 2800 年—公元前 2000 年），便处于古埃及的控制之下。到了公元前 16 世纪，古埃及王图特摩斯三世对腓尼基形成了更加强有力的控制，通过向巴勒斯坦等地区发起攻击，图特摩斯三世将众多包括推罗王在内的腓尼基王公扣为人质，推罗和众多其他腓尼基城市由此臣服并对埃及缴纳贡赋。^[2] 直到公元前 12 世纪，“海上民族”^[3] 试图夺取腓尼基控制权

[1] [英] 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1 页。

[2] H Jacob Katzenstein, *The History of Tyre, 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Press, 1997, p. 23.

[3] 据《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海上民族尤指公元前 13 世纪入侵安纳托利亚东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埃及的任何侵略性的航海者集团。

并攻打埃及,尽管埃及在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影响下最终将入侵者赶出埃及本土,但是元气大伤的它无力将入侵的海上民族赶出腓尼基地区,自此古埃及对腓尼基的控制大大减弱,腓尼基的众多城邦得以摆脱强敌的控制,商贸得以迅速发展。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腓尼基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北至阿勒颇地区,南至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北部等地区,随处可见腓尼基商人们的身影,在此期间,推罗的发展尤为迅速。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发展,推罗人对海上商路的依赖逐渐加深,于是集中精力优先发展海军,“海军主力几乎都是从拜比鲁斯、西顿、阿瓦德、比提尼亚(Bithynia)、吕底亚等地募集的雇佣兵”^[1],加之推罗人精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它的海军很快便成为地中海地区公认的最强悍的军事力量之一。在繁荣的商贸和强大的海军力量的支持下,腓尼基人曾一度称霸地中海地区,在数个世纪之间在地中海东西部地区和北非沿海地区建立了诸多殖民地,其中推罗的著名殖民地迦太基便是在此期间建立的,腓尼基人的商贸活动也拓展到了地中海之外更广袤的地区。及至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入侵,腓尼基大部分城邦再次落入亚述帝国之手,自由的商贸活动被迫中断,这种情形持续了一百多年。自公元前6世纪后,随着亚述帝国的衰落,腓尼基几经波折,先后又被古埃及、新巴比伦征服,在这段时期里,腓尼基一直以相对独立的城邦而不是领主国的附庸而存在。直到公元前6世纪,腓尼基被波斯帝国征服,被归入到波斯帝国的版图并被划分为第五行省,此时的腓尼基城市已然不是最初的独立城邦。此时恰逢西亚地区的文明开启文化大融合阶段,之后的数个世纪里,腓尼基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

在腓尼基存在的漫长时间里,尽管西顿、推罗、毕布罗斯和阿拉杜斯王国等腓尼基各个城邦拥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但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腓尼基各城邦并未形成政治上的统一,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因此,我们研究的腓尼基的历史其实就是这些准独立城市国家的历史。

2. 腓尼基内部的政制

腓尼基的政制不仅仅是腓尼基各个城邦内部的政治制度的叠加,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腓尼基各城邦在不同阶段的冲突与合作等关系也应该纳入我

们的观察范畴。

如前所述,腓尼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它的各个城邦也从来没有构成统一的政体。腓尼基存在的漫长岁月里,常常处于周边强国的窥伺和武力征服之下,腓尼基的众多城邦很少会彼此合作。西班牙的历史学教授玛利亚·欧根尼娅·欧贝特(Maria Eugenia Auber)曾提出,腓尼基所处的这片海岸平原是由块状的区域构成,彼此之间被河谷和山脉分割开来,这种地形有利于个别的政权发展成为城邦,^[2]助长了腓尼基人之间的分裂。几乎除了西顿之外所有的腓尼基城邦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城邦背后直接通向黎巴嫩山脉,城邦内的农耕用地少得可怜,贫瘠的土地打破了腓尼基人对陆地的幻想。腓尼基城市大多依靠海港建造,天然的海港吸引着腓尼基城邦的居民奔向地中海深处,而不是寄希望于贫乏的陆地上的邻邦往来,这造成了腓尼基城邦之间鲜少合作的现象。

腓尼基的各个城邦之间彼此独立,自成一体。城邦之间并不存在长久的稳定联盟,这些城市独自行动,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船队,甚至在很多时候存在利益冲突。比如在公元前585年到公元前572年之间,推罗曾独自反抗亚历山大大帝的进攻,此时的西顿则扮演着帮凶的角色,帮助亚历山大大帝攻打推罗。又比如公元前7世纪初,西顿的鲁利国王(King Luli)统治腓尼基南部的一大片区域,其中包括推罗的大陆殖民地。^[2]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腓尼基城邦之间不仅存在冲突,也存在过短暂的区域联盟。推罗、西顿和阿拉多斯共同参与创建了黎波里殖民地,根据狄奥多罗斯的记载,的黎波里在腓尼基的众多城市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腓尼基人在这里召开共同会议,商讨重要事务。^[3]但是遗憾的是,狄奥多罗斯并未提及哪些城邦参与会议、会议何时召开、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多久。但我们可以从这段文字中做出这样的推测,在公元前350年左右,面对波斯帝国与日俱增的压力,腓尼基的数个城邦在的黎波里成立了一个政治联盟,且

[1] I M Diakonoff, *The Naval power and trade of Tyre*,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1992, p. 181.

[2] Josephine Quinn, *In Search Of Phoenici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17.

[3] Same as above note, p. 119.

这种联盟有着扩大的趋势。直到亚历山大大帝步步紧逼,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腓尼基城邦之间的联盟关系逐渐溃散,才出现了前面提到的西顿帮助亚历山大大帝攻打推罗城的事件。纵观腓尼基各城邦的历史,腓尼基的各个城邦多是独立的政治单位,存在类似文化、宗教信仰和商业模式,且常处于彼此竞争的状态,即使偶尔面对强敌的威胁时会结成较大规模的区域性集合体,也只是公元前4世纪的昙花一现。

从较为微观的角度看,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腓尼基各城邦的君主制贯穿始终,推罗、西顿、阿拉杜斯和毕布罗斯都是有着悠久君主制历史的国家。^[1]腓尼基的各个城邦由世袭的国王统治,正如椰哈米克(Yehawmilk)的雕刻所展示的那样,国王们身着波斯风格的服饰。^[2]可以肯定的是,腓尼基各城邦的统治者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国王们统率军队,掌管宗教事务。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海军作战记录显示,国王肩负着统率王国舰队或者其他武装力量的职责。按照腓尼基的传统,国王的宗教职能和政治职能是合在一起的,国王们往往同时兼任本城邦的祭司,西顿的国王塔布尼特(Tabnit)和埃斯蒙纳扎一世(Eshmunazar I)便是如此。现存的明文也可以证明国王确实从事宗教相关的活动,如修建诸神的圣所等,西顿的埃斯蒙特纳扎二世和西顿的波达斯塔特便曾为信仰的主神重建圣所。^[3]

与后世不同的是,腓尼基各城邦并未出现长老议事会的影子,人们经常推测的长老议事会和国王们共享政治权力的说法更是无从谈起。在前波斯时代,我们很难从阿萨尔哈东和推罗的巴尔签订的条约中,推断出类似机构的存在。公元前4~5世纪更是没有此类机构存在的证据。至于最为引人争议的推罗向亚历山大发出请求的普莱斯贝斯(Presbeis)西顿国王滕内斯(Tennes)身边作为顾问的100名杰出公民,但它们只是在危急时刻的非常设代表团,而不是独立于国王的权威宪政机构。^[4]我们可以从上述事件中得到这样的结论,当国王和臣民的意见相左时,臣民的意见应该被考虑。在腓尼基的众多城邦中,表达这种不满意的代表是构成上层阶级的大富商家族。大商业主很早就掌握了腓尼基的重要权力,在腓尼基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点毋庸置疑。关于腓尼基城邦的政治架构,我们

只能描绘出一个粗略的架构,更加细节的部分无从查考。

3. 腓尼基对外的政制

食物短缺、周边国家对奢侈品的需求和政治危机推动着腓尼基城邦向海外殖民。公元前11世纪之后,推罗等腓尼基城邦人口迅速增长,但城邦耕地面积狭小,难以满足新增人口的粮食和饮水需求,庞大的人口和贫瘠的资源之间产生了矛盾。亚述帝国的几次军事扩张活动对腓尼基的商贸造成了重大打击,为发展商贸,腓尼基人不得不深入地中海深处。在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依靠高超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腓尼基的众多城邦走上了海外殖民道路。由于现存的史料对推罗以外的城邦少有提及,无从考证,所以下面的内容主要围绕着推罗的海外殖民和政制设计展开。

推罗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建立了海外殖民地,直到公元前9世纪才开始全面扩张活动,它早期的殖民动力往往源于对殖民地的矿产资源需求。在东部地中海地区,推罗在公元前10世纪确立了在塞浦路斯岛的主导地位,塞浦路斯岛丰富的材料和矿产资源对推罗在地中海地区的商业贸易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在西部地中海地区,推罗的殖民地集中于伊比利亚南部地区。加迪尔(Cadiz)和托斯卡诺斯(Toscanos)是推罗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的两个重要殖民地。在北非沿海地区,推罗很早就建立了殖民地,如乌提卡(Utica)、希波(Hippo)和迦太基等。推罗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它的海外殖民地有密切联系,这些广泛分布在地中海和北非沿海地区的殖民地既为推罗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原材料,也是推罗的主要海外市场,推罗商贸的繁荣离不开海外殖民地的有力支持。

腓尼基的外部政制是在上述殖民地推行的政制。对政制的把握,不能只从规范性角度进行考察,

[1] [英] F.W.沃尔班克, A.E.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六卷), 胡玉娟、王大庆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第332页。

[2] 同上注第359页。

[3] 同上注第361页。

[4] [英] 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毁灭: 古文明的兴衰》, 孟驰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第127页。

还要关注规范背后的宗教、文化和伦理因素。因此,研究腓尼基对外的政制,不仅要研究腓尼基在其海外殖民地推行的制度,而且要关注政治结构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联。

由于史料少且零碎,本文只能结合现存的史料简单地勾勒出腓尼基政制的轮廓。海拉姆国王曾镇压科新地区的反叛活动,并迫使当地居民向推罗交纳贡赋。科新的统治者承认他是“推罗皇室的仆人,并且向推罗的神庙提供贡品”。迦太基也会定期向推罗交纳贡赋,按照传统,交纳贡赋的比例大概是城邦当年收入的十分之一。^[1]由此可见,腓尼基与海外殖民地之间是臣属关系,殖民地要定期交纳贡赋,少有文字记载的其他殖民地很有可能也是如此。

但值得注意的是,推罗的殖民地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如推罗将加迪尔变为殖民地之后,仍常常将贵重的象牙、珠宝或者青铜制品等送给掌握大量土地和矿产的贵族,以达到商贸的目的。这段记载表示,殖民地的资源仍然被当地的贵族垄断,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自主权,推罗并没有实现对殖民地的完全掌控。

推罗也曾设置经济和军事机构管理殖民地。有材料证明,推罗曾在加迪尔设置了具有管理职能的机构来协调各地区的金属加工和运输。公元前700年左右,推罗已经控制了托斯卡诺斯的沿海地区,并在沿海修建了防御工事。^[2]但是这些机构是否兼具地方管理属性,推罗是否派遣军队驻守殖民地不得而知。推罗是否在海外殖民地设置了专门的政治管理机构、机构由哪些人管理也无从查考,但通过研究发现,推罗的神庙在管理殖民地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三重属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地方管理机构的作用。

推罗会在建立起新的海外殖民地之初,同时兴建一座美刻尔神庙,塞浦路斯、迦太基、马耳他等殖民地都发现了美刻尔神庙的遗迹。政治属性表现在,推罗在殖民地象征着推罗君主的无上权力,也是殖民地和推罗臣属关系的有力证明,同时美刻尔神庙有一定的管理职能,可以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3]经济属性则表现在,美刻尔神庙是根据神的指示建成,受到神的庇护,因而有时可以充当交易的场所,这里可以保证商人们不被抢夺,作为回报,受到庇护的商人们会交纳数量可观的财物,同

时神庙也接受信徒们的供奉和馈赠,财物由神庙的神职人员保管。除此之外,通过在殖民地建造宣传自己的主神,定期举行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推罗人通过平和的手段将他们的信仰推广到当地人之中,为融入当地人搭建了有利的平台。推罗的美刻尔神庙在殖民地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推罗在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之下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并在地中海地区、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和北非地区建立众多海外殖民地。结合前面有限的材料看,推罗与殖民地之间是臣属关系,殖民地需要定期交纳贡税,但是原有的制度可能保留了下来,殖民地地位相对独立。在推罗管理殖民地的过程中,美刻尔神庙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殖民地管理机构和贸易场所。

尽管腓尼基众多城邦之间的政制并不完全相同,但推罗作为腓尼基城邦的典型,与其他城邦拥有类似的历史传统、商业文化和宗教信仰,从它的制度设计和宗教习俗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腓尼基城邦外部政制的影子或相似之处。

(二) 迦太基政制的早期建构

1. 迦太基早期政制的基础

迦太基是推罗在公元前814年于北非建立的殖民地之一,^[4]其地理范围与今天的北非突尼斯基本重合。迦太基拥有肥沃的土地和天然良港,地理位置优越,十分有利于商业贸易发展。但是起初迦太基只是推罗的淡水和粮食供应地,商贸并不发达,迦太基的许多商品仍然依赖进口。在北非频繁商贸活动的带动下,以及公元前670年前后推罗人在亚述帝国的压力下集体迁入北非,迦太基的商业和手工业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依托母邦推罗开辟的“金属航线”和殖民地,迦太基人控制了获取金银等贵重金属材料的海上交

[1] Josephine Quinn, *In Search Of Phoenici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18.

[2] Sabatino Moscati, *The Phoenicians*, New York, 1988, p. 232.

[3] Josephine Quinn, *In Search Of Phoenici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65.

[4] [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通要道,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三条主要的贸易航线。这三条航线分别是东部经由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通向伊特鲁里亚的航线、中部到达利比亚的陆上航线和西部到达大西洋的海上航线。通过中部航线,迦太基人可以获取奴隶、珍贵的象牙、金子和鸵鸟等。通过东部航线,迦太基人用陶器和香料等与当地人换取狮子、豹子和皮革等物品。通过西部航线,迦太基人获得锡和铅等矿产资源。迦太基人也因此成为继腓尼基人之后在地中海西部、非洲大西洋沿岸等地区的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

迦太基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国家。商业永远是迦太基人心中最为推崇的职业。“在迦太基,富豪强于地主……迦太基的农业家一概是大地主和蓄奴隶的人……商业大城所独具的一切富豪现象已到处流行”^[1]。“他们的居留地只是商馆。由他们的眼光看,获得远方的广袤领地而在那里费力而持久地推行殖民事业,不如与土人交易的重要”^[2]。迦太基的一切制度设计都是为了保证商业的顺利进行。为保障迦太基人对“金属航线”的垄断,迦太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

为保障商路安全,迦太基在商业航线沿线建立殖民港口。为了保证货物供给,迦太基在商业港口腹地建立商站。迦太基人贸易航线周边的港口和商站逐渐成为迦太基商人的货物集散地和中转站。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并明确的是,迦太基的政治目标是保证商业顺利进行,它所有的政制设计也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运作。

2. 迦太基早期政制的记载与推测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现存的自迦太基建城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的有关政制的史料十分稀少,以至于我们对这段时期的迦太基政制的了解十分有限,只能在结合现有材料的基础上推测迦太基这段时期的政制形态。

对于迦太基城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的政制形态,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目前学界并无定论。一种观点是,迦太基在建城之初实行君主制。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在《埃涅阿斯纪》中称,推罗的公主狄多(Dido)在她的父王穆托(Muto)死后,与其兄弟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共同执掌推罗大权,皮格马利翁国王为了独揽大权,设计杀害狄多担任大祭司的丈夫歇卡埃乌斯(Sychaeus),无奈之下,

狄多带着大批财宝和人口流亡海外,并在北非的迦太基定居。维吉尔记载,迦太基在建城伊始实行君主制,其创立者是艾丽莎女王,并暗示迦太基存在公民大会和元老院。^[3]另一种观点,即迦太基建城伊始便实行寡头制。按照这种观点,迦太基城最初便由精英阶层组成的布鲁姆团体掌握着统治权力,这个神秘的团体掌握着迦太基城邦的政府、司法、军事和宗教等所有重要机关。位于这个统治阶层最顶端的是掌握着顶级财富和权势的家族,他们拥有支配人民和军队的权力。

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够准确。在第一种观点中,首先,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是史诗题材,本身便带有一些虚构和文学的夸张色彩,不足以采信。其次,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或许我们可以推断维吉尔的这段文字暗示着,在公元前9世纪末,推罗受到了希腊的威胁,在这种压力之下,推罗逐渐将经济中心转移到远离希腊的迦太基,但无论如何,这段话都表明了推罗与迦太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第二种观点中,迦太基建城后繁荣的商贸和城邦经济确实吸引了无数来自其他腓尼基城邦的富有商人和精英阶层来此定居,但是现存的资料中并没有记载存在这样一个掌权的团体,缺乏相关证据证明。

迦太基与母邦推罗存在着密切的宗教和政治联系,推罗建立迦太基城后,推罗人很有可能在迁入的同时将推罗的君主制传统一同带到迦太基。凭借着推罗留下的商业航线和殖民地,迦太基的商业迅速发展,依靠工商业崛起的富商阶层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得到了极大提升,跻身统治阶层,迦太基的发达商业贸易将迦太基原本基于出身的君主制变成了基于财富的贵族制度。根据迦太基的商业国家性质和对金钱的崇拜程度,我们可以推断,早期的迦太基统治阶层不是一个狭窄的固化了的团体,它的精英统治阶层十分灵活包容,对金钱和人才持开放的态度,个人财富的增加或减少很大程度影响着城邦统治阶层的变动。

[1] [德]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页。

[2] 同上注第4页。

[3] [古罗马]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9-103页。

综上,有关迦太基早期政制的现存史料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迦太基早期政制的样态。我们推测,迦太基早期实行基于出身的君主制,之后商业贸易的发展将迦太基的君主制变为贵族制。由于相关史料失传已久,迦太基早期的政权机构和制度构成等更加细节的部分已无从查考,我们只能对迦太基早期政制进行粗略的推测。自公元前6世纪后,迦太基的政制趋于稳定,即便在商业版图和海外殖民帝国扩大的过程中,它的政制进行了相应调整,但这种调整往往不是以暴力反抗而是以渐进的、和缓的方式发生。

二、迦太基政制的内部构成

迦太基国家除了以发达的商贸和财富闻名于世,还以政体的稳定和持久著称。迦太基政体是共和政体,波里比阿将迦太基政体、罗马政体和斯巴达政体看作是共和政体的典型,它的政体中混合着以苏菲特为代表的王制元素,以元老院、五长老团、一百零四人院和将军为代表的贵族制因素和以公民大会为代表的民主制元素。由于迦太基本身的文字记载基本失传,我们只能从一些考古证据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阿庇安的《罗马史》、李维的《自建城以来:第二十一至三十卷选段》、西塞罗的《论国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波利比乌斯的《通史》等古希腊著作中推断迦太基政制的大体样貌。从时间上看,下文主要对公元前6世纪迦太基政体基本稳定后到迦太基灭亡时的政制进行研究。

(一) 迦太基政制中的王制元素——苏菲特

1. 苏菲特的发展

迦太基的苏菲特在布匿语中被称为 shophetim (意为法官),在希腊语中被称为 basileus (巴塞勒斯),在拉丁语中则被称作 suffete (苏菲特)。苏菲特可能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或者前7世纪末,一块已经破损的公元前500—450年的布匿石碑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1]但由于石碑上记录的时间已经模糊,对于石碑记载的时间解读存在三种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块石碑可以追溯到苏菲特统治的第二十年,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块石碑可以追溯到苏菲特统治的第一百二十年,最后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没有相关年代记载。君主制直到公元前620年甚至更

晚才被苏菲特所取代,那么以此推算,如果前两种观点中任何一个观点成立,那么表明迦太基的君主制至少持续了两三百年。反之即使前两种观点不成立,但是可以推断的是,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时代,苏菲特已经成为迦太基最高长官,执掌重要权力。^[2]

在公元前5世纪和6世纪,迦太基仅由一名苏菲特管理,例如公元前6世纪的马尔丘斯(Malchus)和公元前480年被选为苏菲特的哈米尔卡都是当时唯一的最高行政长官。到了公元前3世纪左右,迦太基的苏菲特由一名增至两名,共同管理迦太基城邦事务。关于迦太基苏菲特的具体数量存在不同的记载,但是多数学者认为迦太基每年选任两名苏菲特处理城邦事务。与西塞罗同时代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提到,迦太基每年都会选出两名苏菲特,并以当年当选的苏菲特的名字纪年,此种纪年方式不仅在迦太基城邦内部适用,在利比亚和撒丁岛等迦太基海外殖民地同样适用,这在现存的几个迦太基铭文中有所记载。^[3]由两个以上的苏菲特治理迦太基的证据很薄弱,罗马监察官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似乎记载了迦太基每年选举四位苏菲特,他们协同合作,负责征兵和出兵。^[4]但遗憾的是,目前只能看到一个非常残破的句子,且没有上下文,其记载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即使加图的记载是真实的,可能也只是迦太基某一时期的特殊做法,迦太基同时选出四位苏菲特的情形是很少见的。

综上,迦太基自公元前814年建城,在建城最初的两百多年里,一直沿着君主制。到了公元前6世纪或者公元前7世纪末,君主被城邦推选的苏菲特取代。最初仅有一位苏菲特作为最高长官,处理城邦行政事务。最晚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苏菲特由一名增至两名,共同处理城邦事务,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迦太基灭亡。

[1]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75.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8—99页。

[3]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14.

[4] Same as above note, p. 27.

2. 苏菲特的权力

苏菲特由迦太基城邦的富有公民选举产生，任期为一年。^[1]这种选举的方式直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仍然适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描述，迦太基的苏菲特并不是长期从某一身居高位的家族选拔，而是从掌握城邦重要权力的数个宗族中选出，但是苏菲特的推选兼具财富和才德双重标准，并非对所有公民开放。

苏菲特在希伯来语和其他几种闪米特语言中，意为“法官”，可以推测苏菲特这一职位自诞生时便掌握司法权力。在各个独立的腓尼基城邦——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西部的海岸上的腓尼基殖民地以及迦太基城邦本身，苏菲特都是作为城邦最高行政长官存在，他们被授予对城邦的控制权，官制的运作方式和罗马大致相同，比如他们都是由选举产生，他们的任期都是一年等。通过李维对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历史的描述，我们可以列举出苏菲特们的职责，包括召集长老会议、主持民众大会，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2]以及担任审判案件的法官。李维认为，迦太基苏菲特的人数、任期和权力与罗马执政官十分相似。^[3]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与罗马执政官相比，迦太基苏菲特并无军事权力，亚里士多德多次对迦太基苏菲特和将军进行过区分。^[4]苏菲特可能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或者公元前7世纪末，将军这一职位可能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中晚期，因而将军这一专门的军事统帅的成立要早于苏菲特，即苏菲特很有可能自诞生之初便无军事权力。在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记载中，苏菲特可以与长老院共同商讨城邦事务，只要他们之间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对城邦事务作出最终决定，而无需经过公民大会的表决；反之，苏菲特和长老院无法达成一致的事务，则需要由公民大会作出最终决定。此外，苏菲特还与元老院共同行使立法权。^[5]由此可见，迦太基的苏菲特的权力可能更多地集中于行政和司法方面。

综上，迦太基的苏菲特由富有的公民按照才德标准，从掌握城邦重要权力的数个家族中选出，任期为一年。迦太基有专门的将军掌握军事力量，因而苏菲特一开始就不享有军事权力。作为迦太基的最高行政长官，苏菲特的权力主要集中在行政和司法两个方面，他们可以召集长老会议、主持民众大会，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2]以及担任审判案件

的法官，同时与长老院共享立法权。苏菲特在公元前6~7世纪之后出现在迦太基的政治生活中，中间经历了一百零四人院的削弱，一直在迦太基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直到迦太基灭亡。

（二）迦太基政制中的贵族制元素

1. 长老院

腓尼基的国王必须始终与殖民城邦的统治阶级合作以实现对其的管控，后者一般在很早之前便已经形成了一个公认的咨询机构。在迦太基，这一咨询建议机构被罗马人称之为长老院（*adirim*），被希腊人称之为长老会议（*gerousia*）。长老院的长老每年由公民大会选任。^[6]根据李维的记载，长老院由包括苏菲特在内的三长老领导，^[7]据此可以推断，迦太基长老院的成员数量应数倍于此，当代学者估算为300人。^[8]长老院会面的场所在比尔萨山的巨大广场上，那里是商业和行政管理的枢纽所在。

迦太基的长老院不仅是咨询机关，更拥有广泛的权威。在城邦管理方面，亚里士多德这样记载，苏菲特召集并咨询长老院对城邦事务的意见，如果苏菲特和长老院意见统一，则可以直接决策并采取行动，而无须召集公民大会进行表决。但苏菲特和长老院在意见一致时也可以选择召开公民大会讨论

[1]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ebis Group, 2010, p. 59.

[2] [英] F.W.沃尔班克, A.E.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六卷), 胡玉娟、王大庆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第540页。

[3]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第215页。

[4]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37页。

[5] 同上注第99页。

[6] [俄]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 王以铸译, 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187页。

[7] [古罗马] 提图斯·李维:《自建城以来:第一至十卷选段》, 王焕生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第163页。

[8] [俄]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 王以铸译, 上海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253页。

决定,公民大会有权拒绝通过。^[1]此外,迦太基长老院有权处理外交关系以决定战争与和平,尽管这一职权的行使可能要得到公民大会的批准。例如迦太基长老院在公元前256年拒绝罗马的雷古卢斯(Gaius Atilius Regulus)提出的苛刻的和平协议,在公元前218年接待罗马使节并接受罗马发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宣告,在公元前149年向包围迦太基城市的罗马人宣战等,这些都是强有力的证据。在军事方面,长老院也享有广泛权力。如汉尼拔(Hannibal)在坎尼(Cannae)战役取得胜利后,长老院派遣新的军事力量前往撒丁岛和西班牙,并为汉尼拔提供大量物资和金钱增援。又如公元前147年就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对囚犯的野蛮对待进行谴责等。

此外,一些城邦内部的决定也被零散地记录下来。如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为了反对泛希腊化,长老院颁布命令禁止城邦公民学习希腊语。在公元前195年,汉尼拔为了避免受到迫害而流亡海外,迦太基长老院在罗马派遣的使节的逼迫下颁布法令,没收汉尼拔的全部财产,推倒他的房屋,并正式驱逐汉尼拔。

上述的决议是以苏菲特提案的形式通过并宣告,在决策作出时,统治集团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分歧。例如,尽管公元前256年迦太基最终作出了与罗马战争的决定,但是城邦内不乏接受和平协议的声音。在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在扎马战争失败后不得不接受西庇阿的苛刻条款时,城邦内依然有人反对议和。但是,当城邦由一个强大的政治派系领导和操控时,长老院和苏菲特的决定就会很自然地服从派系的意愿。李维和阿庇安描述的长老院中的反巴卡家族(Barcids)的小团体无法动摇巴卡家族的政策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

长老院的职权在之后几个世纪的具体变化无从得知,我们只能从古希腊罗马作家记载的片段中做出大体推断。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失败引起了迦太基城邦内部对于寡头统治的不满,民主运动高涨,最终导致改革。波利比乌斯记载:“汉尼拔战争开始时,迦太基在衰落,罗马却在上升……在迦太基,人民在国家会议上已起到主要作用,但在罗马元老院仍是决定性力量。这意味着在此地民众决议事务,在彼地由最优秀的人决策,结果证明罗马人决定国

家大事的做法是英明的。”^[3]显然如果波利比乌斯的记载真实准确,在这段时期内,苏菲特和长老院的职权和地位下降,公民大会的地位提高了,在城邦事务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此时迦太基的寡头共和制中已经出现了向民主制发展的趋势。

2. 五长老团

亚里士多德再次简略地提及迦太基的另一重要机构——五长老团。五长老团的新成员由现有成员选任,团内的人出缺时便由团内其他人补选。^[4]五长老团的成员们为无薪服务,他们掌管着城邦重要事务,如推选城邦重要机构一百零四人院的成员、审判法律案件、监管城邦内部的许多部门等。^[5]五长老团成员的任期比其他机构成员更长,但是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五长老团成员的权力在他们入职之前或者任期届满后依然存在,这意味着五长老团通常会有五个以上的成员,每个成员都掌握着重要权力。

迦太基铭文没有提到任何人属于五长老团,但是确实证明存在一个十人委员会,那么五长老团是它的组成部分还是它的细分呢?此外迦太基铭文提到,迦太基设立了司库官员,他们可以对未缴纳税款的人施以惩罚。如果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正确的,按照他的说法,五长老团掌握城邦重要职权并可以审理案件,要么五长老团与十人委员会的职能存在交叉和冲突,要么可能是迦太基存在多个五长老团。迦太基的资料如此的稀少和零散,导致如今对其机构了解甚少,这些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诸如税收、圣地和司法事务之类的公共任务由于其重要性,往往要求更长的任期(可能是三年到五年)以实现职位的更大的连续性。^[6]那么此时存在多个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9页。

[2]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95.

[3] [古希腊]波利比乌斯:《通史》(上卷),杨之涵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51页。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0页。

[5] 同上注第101页。

[6]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31.

五长老团便十分有必要。

五长老团执掌城邦重要权力，在城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成员数量远超五人，但是具体数字无法判断。根据现存资料来看，五长老团的职能很可能涵盖财政、宗教等方面，具体细节无从查考。囿于材料所限，本节仅能将有限的零散材料加以运用和列举。

3. 一百零四人院

最初由长老院和苏菲特对将军的军事表现作出评判和奖惩，但是这一传统在公元前5世纪或者是4世纪早期发生变化，为了掣肘野心勃勃的军事将领，迦太基设置了一百零四人院。亚里士多德称，一百零四人院是迦太基最高权力机构，由法官们组成，法官们由五长老团根据功绩和其他的未知的标准进行选拔，终身任职。^[1]亚里士多德将一百零四人院与斯巴达的监察官制度进行比较，认为其职权与斯巴达的监察官类似，由此可见一百零四人院是一个审判监察机构，但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未提及一百零四人院的具体职能。

一百零四人院在设立之初是为了审查将军的行动，它在最开始便拥有定罪和处决战败将军和罪犯的权力。一百零四人院还因处罚战败将军的残酷手段而声名狼藉。至少在有记载的时期，一百零四人院对战败将军的处罚是将其钉在十字架上。如公元前241年被罗马人打败的汉诺将军便被施以此种刑罚。迦太基军事将领对此常常心怀恐惧，有时甚至会在战败后自杀以逃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命运，如公元前344年或公元前343年的马戈将军便是例证，但在他自杀后，他的尸体仍然难逃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命运。^[2]

一百零四人院的存在使迦太基的军事将领在战争中步履维艰，出于对战败可能受到惩罚的恐惧往往使将领们表现得过于谨慎。那么迦太基的将军们在战败后受到的判决是否公正，又会有多么公正呢？众所周知，迦太基的官员们往往身兼数职。迦太基的将军们也沿袭这一惯例，他们往往同时兼任一百零四人院的成员，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一百零四人院中既有朋友也有敌人，他们共同参与着迦太基的政治生活。这就导致无论案件的是非曲直是怎样的，一百零四人院的成员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而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至关重要。在迦太基存续的数百年时间里，少有关战败将军的惩罚记载。如前面所提

及的，迦太基的海军将领汉诺将军在公元前241年在西西里岛的埃加迪岛（Aegates island）被罗马击败，并直接导致迦太基人只能接受罗马苛刻的和平协议，战败后汉诺将军被处以酷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纵观迦太基的历史，汉诺将军的遭遇只是个例，更多时候对战败将军的处罚会减轻很多甚至是不了了之。如大约在公元前221年，另外一位战败的汉诺将军遭受重罚后幸存下来，并在五年后再次成为海军将领。又如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在公元前241年与罗马达成了令迦太基人反对的和平协议，在他回国后面临着可怕的军事惩罚的威胁，但现实中这一切并未发生。甚至在扎玛（Zama）之战后，战败的汉尼拔（Hannibal）将军也没有受到国内的军事控诉和惩罚。

在一段时间后，一百零四人院的职权范围不断扩大，受到了迦太基官员们的普遍憎恨和恐惧。一方面，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后，公职人员被笼罩在一百零四人院的阴影之下，一百零四人院的监察权限扩展到了迦太基所有公职人员。公职人员需要向其提供任期内的财产清单，一百零四人院的这种职权与雅典的账目审查有很大相似之处，但比后者的审查范围更广。另一方面，一百零四人院的职权范围也有所扩大，其军事处罚的范围由将军扩展到将军的下属。根据文献记载，一位军官因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放弃西西里岛的麦西拿（Messana）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可能是一百零四人院享有处理其他军事不法行为的权力的一个例证。^[3]

一百零四人院最初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制衡独裁的马戈家族，后来其权力的不断发展扩大，直到公元前2世纪，一百零四人院在军事审判和制裁权力之后衍生出了新的监察权力，迦太基的人民、城市和公职人员都在它的统治之下。在迦太基发展后期，一百零四人院与长老院成为掌控迦太基政治生活的

[1]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2]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ebis Group, 2010, p. 58.

[3] [英] F.W. 沃尔班克, A.E. 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胡玉娟、王大庆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85-586页。

两大团体。^[1]

4. 将军

迦太基早期可能由苏菲特统率军队,后来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这种军事职能被新设的将军取而代之。将军需要经长老院提名和任命,并得到公民大会的认可才能通过。这一职位的设立将迦太基城邦内部的军事权力与民事权力分离开来,这个创举与同时期的罗马形成鲜明对比,罗马执政官往往要同时肩负着行政和军事两项重要职责,裁判官有时不得不同时执行这两项任务。

迦太基人也许在公元前6世纪中晚期的时候才创立将军的职务,那时迦太基开始派遣军队去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但即使已经很早便设立了专职的将军掌管迦太基的军事力量,但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只有那些相对不是特别重要的军事任务可以由将军独自处理,特别重要的军事任务仍需要由苏菲特决定。直到公元前4世纪初,如果形势需要,将军的职权仍然可以由苏菲特接手或者取代,如公元前480年的哈米尔卡、公元前396年的希米尔科(Himilco)和公元前383年的马戈,身为当时的最高长官的他们都拥有在西西里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在对独裁统治的赞歌中,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赞扬了僭主锡拉丘兹狄奥尼修斯一世(Syracuse, Dionysius I),并对迦太基和斯巴达进行研究,他认为迦太基和斯巴达这两个国家非战争状态下在国内实行寡头统治,在战争中实行君主统治。这并不是表明迦太基仍然有真正的君主积极活跃在城邦日常事务中,但这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迦太基的“国王”——即苏菲特至少在他那个时代的重要战役中仍然领导着军队,此时的将军的职权仍然受到苏菲特的制约。

关于将军的具体职权,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到至少公元前2世纪,迦太基的事务大多由军事人员指挥,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马尔库斯(Malchus)、马戈和汉尼拔。马尔库斯是继传说中的建城人迪多女王之后的迦太基的第一位有记载的领导人,他在征服非洲的利比亚和其他海外岛屿的过程中展示了出类拔萃的军事天赋,后被国内的反对力量镇压并处死。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国内的镇压时,马尔库斯的军队展现出了对他的无比忠诚,这种忠诚甚至凌驾于对城邦的忠诚之上,这或许暗示了在此时招募和维持士兵的工作

已经由将军负责,此时的将军拥有招募军队的决定权。到了马戈时期,他已经拥有改良军事编队和军事纪律的权力。在改良军队方面,为了将迦太基步兵改造成一支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步兵军队,马戈引进了希腊式的步兵方阵。此外,马戈进一步规制了迦太基的军事纪律,系统地制定军事规则,很可能据此将招募兵役的权力牢固地掌控在城邦统治者的控制之下。^[2]这种举措可能更多地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未在实践中得到遵守,甚至很可能这个政策的破坏者便是马戈家族本身,因为此后马戈家族的几代领导人实现了对城邦的有力掌控,其中自然也包括军事层面的掌控。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和姐夫哈斯德鲁巴以及汉尼拔本人自行决定并执行城邦的事务,他们对城邦事务的掌控是建立在军事支配力量的基础之上的。此时的将军和苏菲特不是由一人兼任,巴卡家族的将军们都不是苏菲特,但却可以让他们的近亲属和追随者们年复一年地当选为共和国的最高长官苏菲特,更不用说城邦内的其他职位了。

由于明显的原因,将军们没有固定的任期。将军的任期可能要持续到一场战争的结束,或者直到被另一位将军接管指挥权。此外,如果陆地作战(例如在西西里岛)需要一个指挥官,海军作战需要另一个指挥官,或者在不同地区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可以任命不止一个将军进行军事指挥。例如从公元前241年到237年,在北非,哈米尔卡尔·巴尔卡和他曾经的朋友、当时的对手“伟大的汉诺”便都担任着将军职位,由于级别与职权相同,在决策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异议和摩擦。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汉诺将军一度被一位更加配合的将军取代,他虽然法律上与哈米尔卡同等级别,但在军事行动中往往扮演着哈米尔卡副手的角色。这不是一位将军有时可能被任命为另一位将军的副手的唯一证据。两份迦太基铭文中出现过“副将”的记载。他们暗示着存在将军的下一级指挥官,尽管文献中缺乏细节性的记载,但他们经常在迦太基的后期战争叙述中被提

[1]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68.

[2] Same as above note, p. 46.

及。如公元前397年，西西里岛的将军希米尔科（Himilco）任命了一位叫马戈的将军领导舰队，在一个半世纪之后的公元前250年，阿德赫巴尔（Adherbal）任命汉尼拔为海军副将。公元前230年，哈米尔卡巴卡任命他的女婿哈斯德鲁巴为副将，此时在将军之下设置一个次一级的指挥官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惯例。^[1]在公元前237年之后，巴卡家族统治迦太基长达四十年之久。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有多达7位将军在各地率兵作战。在意大利，汉尼拔统筹意大利战局，身边另有一位将军在他的领导下半自由地行使军事指挥权。在西班牙，另有三位将军统兵对付入侵的罗马人。此外，在西西里岛，由一位将军指挥着远征军。最后根据记载，还有一位巴卡家族的将军率领着海军发动了几次军事攻击。^[2]

但将军这一职位在后来发生变化，在公元前201年，罗马打败迦太基并通过签订条约的方式限制迦太基的对外战争活动，这一限制给将军们的职权带来的具体影响是未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将军们的职权会因此受到削弱和限制，要么这一官职的职权发生巨变，要么这一官职直接消失，直到半个世纪后迦太基与努米底亚（Numidia）作战，这一职位才重新出现。根据记载，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存在两名地位平等的将军，一个率军队在乡下作战，另外一个则带领军队包围着被围困的迦太基城，直到迦太基城被毁灭，将军这一职位也随之消失在历史中。

（三）迦太基政制中的民主制元素——公民大会

1. 公民大会的构成

公民大会代表着迦太基政制中的民主因素，在迦太基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较于同时期其他城邦的类似机构，迦太基公民大会的权力明显更大，到了迦太基政制发展后期，公民大会甚至享有国家重要事务的最终决定权。

迦太基公民大会的成员被限定在达到某个年龄的男性公民范围内，他们被要求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3]但具体的财产标准今天已无从查考。迦太基可能存在两类公民：享有完全公民权的公民和享有有限公民权的公民。首先，布匿语的铭

文中提到了这类人，享有有限公民权的很有可能是恢复自由的奴隶。如布匿铭文中记载，奴隶萨福特（Safot）脱离奴隶身份成为自由人，这要归功于主人米尔卡顿。^[4]另有布匿铭文记载，由于欠债，一位叫作汉诺和汉尼拔的自由人愿意为一位叫埃斯蒙哈罗斯（Esmunhalos）的人服务，这与罗马的自由人对他们的旧主的方式相似。其次，在公元前215年汉尼拔和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签订的希腊文字条约中，可以看到迦太基可能存在两种公民身份的证明。在这个条款中使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汇“the lord Carthaginians”，这一词汇与条约中多次出现的指代迦太基人的词汇并不一致，我们或许可以推断这是迦太基存在两种公民身份的证据，但也不排除这可能是一种外交的礼节性用法。在迦太基城邦内部，迦太基的居民被划分为三类人：公民、自由人和奴隶，享有有限公民权的公民很有可能是自由人，他们脱离奴隶身份之后，享有有限的公民权，但无政治权力，没有资格进入公民大会。奴隶既无公民权也无政治权，被公民大会拒之门外。在迦太基之外，其他城邦的人也可以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获得迦太基公民权。如汉尼拔曾承诺，一旦战争取得胜利，他的外国士兵可以获得公民身份。

关于公民大会成员的选举，亚里士多德提到，迦太基实行的“海太利公餐制度与斯巴达的‘菲第希亚’相似”^[5]，并对斯巴达和迦太基的公餐制度进行了比较。但不得不提的是，斯巴达实行公民兵制，而迦太基自公元前6世纪中叶后使用雇佣兵取代了原有的公民兵制度，因此很难据此推断海太利公餐制度的性质和组织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推测，

[1]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ebis Group, 2010, p. 55.

[2] [英] F.W.沃尔班克, A.E.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 胡玉娟、王大庆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第623-626页。

[3]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第195页。

[4]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ebis Group, 2010, p. 52.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98页。

迦太基的公民大会大概是由海太利公餐团体选举产生。^[1]古代社会关系中往往以公餐为特色,这种实践在特定团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在法国境内发现的一块碑文看,迦太基存在多种协会和团体,有些致力于神明崇拜,有些是世俗的工匠行会、前治安官团体或者在战争中有过紧密合作的人,这些团体自然而然地组成了杂食或者用餐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允许公民根据年龄、财富和经验等各种标准选择他们在公民大会的代表,它们在宗教、社会和政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实现社会互助和相互支持。^[2]

综上,迦太基的男性公民满足一定的财产和年龄要求才能入选公民大会,奴隶和自由人不享有政治权利,被公民大会拒之门外。公民大会成员通常由公餐团体根据年龄、财富或者经验等标准选出。

2. 公民大会的职权

公民大会在马尔库斯(Malchus)的故事中首次出现,这是迄今所知的关于公民大会的最早记录。根据贾斯汀的记载,马尔库斯率领军队从海外回到迦太基,惩罚了政治敌人后,他将公民召集起来诉说,抱怨公民对敌人的宽容,并最终给予公民宽宏的饶恕。在这之后,马尔库斯重建城市的法律和合法的政府。如果贾斯汀的记载是正确的,这至少表明迦太基公民在当时是受到一定程度尊重的。在之后的某个时刻,公民大会获得了选举地方法官的权力,并在之后的发展中,获得了对城邦政治决策进行投票表决的权力。^[3]

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公民大会的职权已经包括对长老院通过的决策进行投票、缓和并解决长老院和苏菲特长官之间的决策僵局、选举将军和其他官员的权力。如哈米尔卡担任西班牙总督时,先由军队选举,最后由公民大会发布委任状确认选举结果。^[4]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苏菲特和长老大会达成一致的案件,它们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交由公民大会讨论,反之,则必须提交公民大会进行讨论。此外,对于苏菲特和长老大会一致同意的案件,公民大会并不因此而受限,他们可以在批准和通过之外做出不一样的判断。在这种情形下,苏菲特不仅允许公民大会的成员坐下来聆听城邦统治者的决定,还允许他们对此自由讨论(这是迦太基公民大会特有的一项权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公民大会仅能就苏菲特和长老们提出的议案进行讨论,并

不享有创议权。后来的某个时刻,公民大会甚至拥有了最高决策权,这意味着公民大会逐渐拥有了拒绝提案的权力。部分哲学家认为迦太基是一个民主统治的国家,或许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不得不承认,公民大会在迦太基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时候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

毫无疑问,迦太基的公民大会的权力远超古代世界的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5]但我们很难从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中找到类似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长老大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掌握重要权力,如在公元前218年代表迦太基与罗马开战和在公元前203年讨论缔结合约事宜,这些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之后会在公民大会提出并得到批准。^[6]据此我们可以推测,此时的苏菲特和长老大会作出的每项决策,无论是否已经达成一致,都需要提交公民大会。

在之后的公元前241年到公元前237年的非洲大起义的背景下,公民大会的地位和作用可能更加重要。迦太基的公民必须入伍为城邦的生死存亡而战,他们在非洲殖民地起义期间推选了哈米尔卡巴尔卡作为迦太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在此之后又推选哈米尔卡巴卡的女婿哈斯德鲁巴(Hasdruba)和汉尼拔为领袖,此时以汉尼拔为首的巴卡家族已经操纵了长老大会、一百零四人院甚至是苏菲特的政治机构,与此同时巴卡家族也经常会受到各种质疑和反对,但公民大会的支持使得巴卡家族的统治得以继续维持下去。^[7]

[1]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180页。

[2]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55.

[3] Same as above note, p. 125.

[4] [英] F.W.沃尔班克, A.E.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八卷),胡玉娟、王大庆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2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9页。

[6] [古希腊]波利比乌斯:《通史》(上卷),杨之涵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76页。

[7]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48.

在公元前 201 年，迦太基获得短暂的和平之后，巴尔卡家族丧失了对迦太基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百零四人院获得了对共和国的支配地位，此后的迦太基政局十分腐败。直到汉尼拔结束海外战争回到国内，在他当选为执政官后，很快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彼时的迦太基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早已成为定局，汉尼拔虽然力挽狂澜，但也终究是回天乏术。不久之后，迦太基在与罗马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失败，并最终灭亡，迦太基的寡头共和制也随之消失。

综上，迦太基的主要政权机构是苏菲特、长老院、五长老团、一百零四人院、公民大会和将军。其中苏菲特代表着迦太基政制中的王制元素，长老院、五长老团、一百零四人院和将军代表着迦太基政制中的贵族制元素，公民大会代表着迦太基政制中的民主制元素。苏菲特由选举产生，主要掌握国家行政权以及部分司法权和立法权。长老院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不仅是国家咨询机关，还掌握着重要的外交、军事和行政权。五长老团较为神秘，他们的任期比任何人都要久，掌握着城邦的审判、监察职能，一百零四人院的人选也由五长老团推荐产生。公民大会由拥有一定财产的公民组成，掌握着国家事务的最终决策权。一百零四人院，最初是为了阻止将军权力的僭主倾向而设立，主掌监察，将军和元老院等机构都在其监察范围内，共和国后期，掌握国家主要权力并成为寡头政治的大本营。将军是迦太基的最高军事长官，拥有军事指挥权，他们的任期往往由战争时长决定，由于军事战争的特殊性，迦太基往往同时设置数个将军指挥作战。这些机构间相互协调配合并彼此制约，共同构成了迦太基政体。

三、迦太基的外部政制设计

迦太基财富和势力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口的迅速增加，其有限的领土和资源并不足以满足城邦人口的需要，此时开展海上探险和拓展海外殖民地变得十分必要，迦太基通过开辟海外殖民地，派遣公民到海外殖民地定居的方式，使城邦公民的利益得到满足，达到分散人口压力和缓解国内矛盾的目的。

的。^[1]此时，母邦推罗的衰退为迦太基的迅速壮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迦太基在继承推罗的海上商贸航线和航线周围的海外定居点的基础上，不仅迅速取代推罗成为地中海西部的新商贸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进一步发展。那些原属于推罗的殖民地也成为迦太基殖民的重要战略基地，迦太基的殖民活动以此为基础逐渐开展起来，最终殖民足迹遍布西西里岛、撒丁岛、北非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

（一）迦太基的海外殖民地

1. 迦太基在西西里岛西部的殖民地

西西里岛处于亚平宁半岛的西南部，岛内主要为山地和丘陵，沿海是土壤肥沃的平原地区，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耕业发达。此外，西西里岛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西西里岛是地中海地区的最大岛屿，处于地中海的中心位置，不仅自古以来是地中海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汇点，且在古代海上商贸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战略地位出发，西西里岛历来是地中海强国们的必争之地。

西西里岛在希腊语中意为“被管辖的土地”，在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登上西西里岛之前，西西里岛的原住民是西库尔人（Siculi 或 Sicels）、西坎人（Sicani）和具有特洛伊人血统的伊利米人（Elymian）。^[2]希腊很早就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海上探险和殖民活动，受到早期航海技术的限制，他们大多沿着海岸线航行，在公元前 8 世纪，希腊人来到了西西里岛并逐渐控制了西西里岛东部和意大利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后来腓尼基人的商贸活动发展到西西里岛，为了发展商贸和维护海上航线，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岛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其中以帕诺莫（Panormo）、摩提亚（Motya）和索伦托（Solunto）最为著名，自此希腊人和腓尼基人掌控了西西里岛的大部分沿海地区。

迦太基在西西里岛西部的霸权似乎可以追溯到

[1]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p. 78-80.

[2] [英] F.W. 沃尔班克, A.E. 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 胡玉娟、王大庆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376 页。

公元前6世纪末。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公元前509年时,西西里岛有一区由迦太基统治。根据迦太基与罗马在公元前509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记载,“来到由迦太基控制的西西里任何地区的罗马人,可以享有其他人所享有的商业权利”^[1],值得注意的是,条约中仅涉及迦太基统治之下的西西里地区,而非整个西西里岛,这说明此时的迦太基仅仅控制了西西里岛的部分区域而非全部,这是首次明确记载迦太基在西西里岛的霸权,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此时的迦太基成为西西里岛西部地区的强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狄奥多罗斯这样记载,迦太基与叙拉古狄奥尼西奥斯一世签订条约,迦太基人接手杰拉(Gela)和卡马里纳(Camarina),说不定此时还有其他希腊语族的乡镇一同成为交纳贡赋的附庸,居住在岛屿西部地区的西西里原住民和腓尼基殖民地承认了迦太基在西西里岛西部的管辖权,此时西西里岛上的政权有条不紊地更迭着,迦太基在西西里岛西部的霸权也正式得到了确认。^[2]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迦太基在西西里岛的支配力更加强大,迦太基人发行的货币已经完全取代了当地的原有货币,而且钱币上印着“财宝”和“领土内的字样”,这表明迦太基在此地区已经有了更加强大的制度化的支配力。

此后的数百年里,随着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先后在西西里岛的沿海地区殖民地范围扩展,他们开始争夺在岛上的利益,甚至为此发生摩擦和激烈冲突。起初,分散在西西里岛东部的希腊殖民地人口达到饱和,这迫使希腊人开始在资源相对不那么紧张的西西里岛的西部周围开展殖民活动。此时的迦太基人避其锋芒,退居西西里岛西部,这直接导致希腊人的殖民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先后在西部建立了纳克索斯(Naxos)和叙拉古(Syracuse)。直到公元前535年,迦太基开始与希腊针锋相对,为争夺殖民地大打出手,之后双方为了争夺殖民地纷争不断,甚至在公元前5世纪初期迦太基组织远征军对抗希腊。^[3]迦太基和希腊在西西里岛的霸权争夺持续数个世纪,直到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元气大伤,这场争霸最终才以希腊退出西西里岛的殖民告终。但迦太基迎来了另外一位空前强劲的对手——罗马。

迦太基和希腊在争夺西西里岛的霸权时,罗马正忙于统一意大利半岛,因而无暇顾及这场争斗。

到了公元前3世纪早期,完成意大利半岛统一大业的罗马将目光投向西西里岛,参与到西西里岛的霸权争夺斗争中。

“墨西拿(Messana)事件”成为迦太基和罗马交锋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战争主要在西西里岛进行,战争初期,迦太基占据海军优势,罗马形势危急,在这样的形势下,罗马元老院当机立断,举全民之力发展罗马的海上舰队对抗迦太基。而后,罗马军队发明了一种新的作战工具“乌鸦吊”,“乌鸦吊”是一种带着钩子的长吊桥,当迦太基的战船驶入势力范围时,罗马军队使用“乌鸦吊”勾住迦太基的船只,使其无法自由移动,然后罗马士兵通过吊桥行至迦太基人的战船甲板上作战,这种作战方式使得罗马军人的陆战优势得以发挥到最大,压制了迦太基海军优势,最终导致迦太基节节败退。^[4]

到了战争后期,迦太基军队全面溃败,罗马的军队也被长期战争所累,于是在公元前241年,双方停止战争,签订了条约。战败方的迦太基不得不接受罗马的苛刻条件:迦太基必须撤出西西里岛(包括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之间的所有岛屿);不得对罗马及其盟邦发起战事;不得招募意大利居民为雇佣兵,必须无条件地交出战俘,支付3200塔兰特的巨款,分10年付清。至此,迦太基失去西西里岛的所有海外殖民地,然而这次战败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迦太基一点点被罗马削弱直至最终被消灭。

2. 迦太基在撒丁岛的殖民地

撒丁岛又名萨丁尼亚岛,位于地中海中部地区,是地中海意大利除西西里岛之外的最大岛屿,它是通往意大利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海岸的交通

[1] [英] F.W.沃尔班克, A.E.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 胡玉娟、王大庆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第570页。

[2] Josephine Quinn, *In Search of Phoenici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46.

[3]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eis Group, 2010, p. 50.

[4] Gilbert Charles Picard, Colette Picard, *Carthage a Survey of punic history and culture from its birth to the final tragedy*, Sidgwick and Jackson limited, 1987, p. 102.

要道。撒丁岛的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岛上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吸引迦太基人早期来此殖民的重要原因。

迦太基的母邦推罗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便在撒丁岛沿岸地区建立定居点，之后建立了在撒丁岛的首个殖民地诺拉。^[1]公元前6世纪中叶，来自北非的新殖民者迦太基人来到撒丁岛，迦太基人来此的最初目的是打通商贸航线，并在此目的的推动下实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殖民侵略，之后基本掌控撒丁岛。迦太基人的殖民地主要集中分布在两个区域，一部分位于撒丁岛西南部的三分之一处，那里是岛上最广阔，生产力最高的平原，这些殖民地自建立起便一直繁荣昌盛。另一部分位于撒丁岛东北部的奥尔比亚（Olbia）海湾。撒丁岛出土的墓葬等显示，迦太基殖民者与当地土著通婚。与其他腓尼基殖民地类似，撒丁岛的迦太基殖民者会同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等进行商业贸易。

迦太基在撒丁岛的殖民同样受到其他地中海劲敌的威胁和挑战。自公元前6世纪起，同为地中海强国的迦太基和希腊为争夺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控制权产生多次激烈武力对抗。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希腊开始与迦太基争夺在撒丁岛的利益，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角逐，迦太基最终击败希腊，在撒丁岛拥有了绝对权威。凭借着对撒丁岛的绝对控制权，迦太基与伊特鲁里亚人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并结成同盟，之后通过签订条约的方式维护它们在地中海西部的利益，它们的同盟军曾称霸于亚德里亚海以及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以西海域。

在迦太基控制撒丁岛数个世纪里，尽管间歇性的叛乱依然存在，但撒丁岛仍被迦太基人牢牢掌控着。转折发生在公元前238年，撒丁岛上的雇佣军发起武装暴动。此时的罗马乘虚而入，声称依据第一次布匿战争后签订的条约规定，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之间的岛屿属于罗马所有，那么撒丁岛也应该属于罗马。^[2]罗马迅速派遣军队援助暴军，并趁机抢先攻占了撒丁岛和附近岛屿。迦太基疲于应对暴军和罗马的攻击，被迫放弃撒丁岛，迦太基自此失去了意大利附近海域的全部殖民地，不久之后，撒丁岛成为罗马的海外行省的一部分，迦太基对撒丁岛的控制也正式终结。

3. 迦太基在北非的殖民地

北非地区对迦太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非洲

河流稀少，内陆地区仅有几条河流经过，其沿海地区却降水充足，气候适宜，十分利于农耕发展。但北非内陆被河流和山脉分割，南部地区通向外界的路线被广阔的撒哈拉沙漠阻隔，腹地成片的沙漠几乎阻断了其与尼罗河谷的联系。受到地理因素和资源的限制，最初北非对殖民者的吸引力很小。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甚至更早，迦太基在北非沿海地区确立了牢固的统治地位。到了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入侵北非时，迦太基的势力范围早已拓展到杜加和哈德鲁梅背后的沿海平原地区。到了公元前4世纪，迦太基的触角延伸到了昔兰尼加附近的北非沿岸地区，并再次将腓尼基先祖在北非的早期殖民地收入囊中。根据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地理名著 *Periplus of Pseudo-Scylax* 引用的材料记载，从莱普提斯（Lepcis）地区到整个直布罗陀海峡都属于迦太基人的控制范围。^[3]

在公元前480年哈米尔卡远征西西里岛被希腊打败之后，迦太基的海外扩张活动速度放缓，甚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愿意与希腊展开进一步对抗，于是此时的迦太基将注意力投向了北非大陆，它选择对抗人口众多但是政治分裂的利比亚人。根据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作家色诺芬（Xenophon）的记载，迦太基是北非的统治者，利比亚是被统治者，这是当时希腊盛行的一种观点。通过将利比亚人置于霸权之下并向他们征税，大大增加了迦太基的经济实力。然而，对北非长期的盘剥必然会引起被统治者的不满与反抗，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到公元前396年，这种剥削性霸权的长期存在足以引起利比亚人的反抗，但遗憾的是并未成功。在迦太基相继失去西西里岛、撒丁岛等地区的控制权之后，迦太基加强了对北非的控制和经济盘剥，直到迦太基灭亡。

[1] [英]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2] [英]F.W.沃尔班克，A.E.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八卷），胡玉娟、王大庆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8页。

[3]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110.

4. 迦太基在西班牙西南部的殖民地

在很早的时候,迦太基与西班牙南部的贸易就已经开始了。来自西班牙的陶器遗骸可能是迦太基所有现存遗骸中年份最为久远的,它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1]迦太基与西班牙大西洋沿岸地区和西班牙西南地区贸易格外频繁,希腊人将这片区域称之为他泰撒斯(Tartessus),它以盛产银矿闻名。加迪斯是西班牙南部地区与地中海周边其他地区交易的主要中转港口。西班牙社区使用银、铜、铅、盐、谷物和皮革与国外交换葡萄酒、石油、纺织品、珠宝和器皿。这些交换的物品越来越多地包括迦太基制造或迦太基从其他地区运输来的商品,如来自乌蒂卡(Utica)的石油。出土的运输罐(双耳瓶)可以表明,当时的葡萄酒和石油业务已经十分庞大。在西班牙南部地区的贵族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珠宝、灯具、象牙饰品等,这些都是迦太基和西班牙地区往来更加紧密的证据。^[2]

到了公元前237年,相继失去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这两个重要海外殖民地的迦太基遭受重创。不仅国内因为战争失败人心惶惶,外部财政也大受削弱。一方面迦太基面临着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失败后迦太基要向罗马支付3200塔兰特。另一方面,迦太基在失去西西里和撒丁岛的海外殖民地的同时也意味着它失去了在这些地区的商业垄断权、税赋和其他权力,失去两大经济来源的迦太基在供养城邦人口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战败后的迦太基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此时以哈米尔卡为代表的迦太基统治阶层将触手延伸到西班牙南部地区,并计划在公元前237年远征西班牙南部。西班牙位于地中海的另一边,南部地区开发良好,银、铜等矿产资源丰富,当地的城镇和人民与迦太基文明存在长期贸易等密切接触,南部地区的重要港口加的斯又是腓尼基旧殖民地,是合适的桥头堡,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迦太基在公元前237年的远征。

从公元前237年开始,哈米尔卡一方面通过联姻的方式笼络西班牙部分部落,如汉尼拔和哈斯德鲁巴都娶了西班牙部落首领的女儿为妻,另一方面通过扣押人质的方法获得土著的服从,哈米尔卡在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229年哈米尔卡遇刺去世,哈米尔卡已经将统治范围延伸到了

贝蒂斯河(Betis)附近。哈米尔卡去世后,他的女婿哈斯德鲁巴成为西班牙殖民地新的统治者,后来他和罗马签订条约,约定双方的势力范围以埃布罗河为界限。到公元前221年哈斯德鲁巴遇刺身亡后,汉尼拔成为新的西班牙殖民地统治者。

迦太基对西班牙内部城市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通常是外交手段和战争并用。^[3]一方面,对于腓尼基人遗留下来的殖民地,迦太基一般以结盟的方式获得它们的支持。另一方面,对于西班牙本土反抗激烈的社区,迦太基则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获得社区的服从。波利比乌斯和狄奥多鲁斯对此有粗略的记载。就像在利比亚的战争中一样,哈米尔卡可以在合适的情形下以残忍的方式肢解或者钉死战败的西班牙社区的酋长,但这种情况是十分少见的。到了公元前228年,迦太基在此拥有一支超过50000名的强大军队和来自非洲的100只战象组成的军团,尽管本土城市的起义时有发生,但无一不被迦太基顺利镇压,此时的迦太基在西班牙南部地区的统治已经十分牢固。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班牙成为巴卡家族发展势力和积累财富的大本营,随着迦太基在西班牙殖民范围不断扩大,源源不断的财富和战利品被送回国内,迦太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盛。根据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的记载,“他用马匹、武器、人力和金钱丰富了整个非洲”^[4],士兵(可能是战俘)极有可能像公元前307年后阿加托克勒斯军队中的奴隶一样被派往城镇和乡村工作,武器包括当时备受推崇的铁制的剑和标枪,金钱则是来自战利品和贡品以及越来越多的来自西班牙殖民地的矿山。西班牙南部地区一直处于迦太基的巴卡家族掌控之下,即使哈米尔卡死后,他的地位和官职很快就被女婿哈斯德鲁巴和儿子汉尼拔继承。第二次布

[1]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92.

[2]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65.

[3] [英] F.W.沃尔班克, A.E.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八卷),胡玉娟、王大庆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0页。

[4]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176.

匿战争爆发时，西庇阿攻陷了迦太基在西班牙建立的中心城市——新迦太基城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统治开始崩坏，到了公元前 206 年，迦太基彻底失去对西班牙地区的掌控。

（二）迦太基对外的政制设计

1. 迦太基在殖民地的政制设计

迦太基的海外扩张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在主观上，公元前 8 世纪之后，希腊开始大规模向海外殖民，在黑海北岸、亚平宁半岛、西西里岛和伊比利亚半岛等地区建立许多殖民地，来自殖民地的财富使希腊短时间内大获成功，这对迦太基当权者产生很大的思想冲击。在客观上，工商业迅速发展，商人阶层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为了拓展海外市场，商业集团不断推动海外扩张。迦太基对外扩张的主观动力是希腊世界“分离主义”精神，迦太基对外扩张的客观动力是商业集团的推动。迦太基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国家，十分注重商业贸易的发展。为了保护商业贸易顺利进行，迦太基在西西里岛西部、北非沿岸、撒丁岛和西班牙南部建立了许多殖民地。这种殖民纯然是经济性的，是为了猎取经济利益，而非出于政治扩张目的。在此背景下，迦太基的海外殖民地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充当着迦太基海外中转站和贸易站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迦太基在各海外殖民地间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制度，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城市的管理制度也不尽相同。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迦太基继承了推罗的殖民地，西西里岛、北非等海外殖民地成分复杂，常常是土著城市、腓尼基原有殖民城市甚至希腊的海外城市混合分布。总体而言，腓尼基旧城享有优待，腓尼基的殖民地乌提卡加入迦太基后享有特权待遇。^[1]迦太基对殖民地的土著城市和腓尼基人的旧城的管理更为宽松，迦太基人与殖民地的腓尼基旧城联系更加密切，授予殖民地的腓尼基人以迦太基市民的荣誉称号的行为时有发生。

迦太基在各大殖民地设置的政治机构并不相同。在公元前 4 世纪左右，迦太基就已经以行省的方式管理西西里岛西部的殖民地。在罗马和迦太基签订的第二个条约中提到，罗马人可以在西西里的迦太基行省和迦太基进行商贸活动。^[2]这不仅体现了迦太基后期对西西里岛西部殖民地政

策的动态变化，也体现了迦太基对西西里岛西部殖民地的控制逐渐加强，但是更具体的机构设置和官员产生方式以及职权等不得而知。在利比亚和撒丁岛，根据罗马和迦太基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记载，罗马在迦太基的利比亚和撒丁岛的控制区域的贸易活动要在城镇办事员或者传令官的面前进行。^[3]这段材料表明在利比亚和撒丁岛存在着管理机构和市镇官员，以加强对迦太基商贸活动的管理。迦太基虽然允许撒丁岛的殖民地区实行自治，但并非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来自迦太基的殖民者在开发撒丁岛上的肥沃土地、建立农庄的同时，也修建了许许多多既可以充当贸易中心，又可以管控乡村地区的要塞化移民点，这些移民点不仅有助于发展商贸，也保证了迦太基对殖民地区的控制。除了在西西里岛实行行省制度之外，并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迦太基将其他海外殖民地划归行省进行管理。

经济上，迦太基在殖民地往往实行严格的经济管控。迦太基海外殖民的最终目的是攫取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既包括商贸利益也包括农业利益。在农业方面，迦太基会以行政命令干涉殖民地的农业生产。撒丁岛是迦太基的重要粮食供应地，根据一篇借亚里士多德的名义发表的文章记载，迦太基很可能为了将撒丁岛变为重要的粮食产区，而下令禁止岛上种植新果树，甚至下令将已经种植的果树毁掉。在商业方面，迦太基十分重视殖民地的商贸垄断权，其他城邦的商人在殖民地的贸易活动需要经过迦太基人的特殊许可。迦太基和罗马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规定，罗马人在迦太基控制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等区域经商，需要在迦太基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且交易要在迦太基城镇官员的面前公开进行。^[4]除了在殖民地的商业垄断，迦太基还通

[1] [英] F.W. 沃尔班克, A.E. 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 胡玉娟、王大庆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第578页。

[2] 同上注, 第582页。

[3]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104.

[4] [英] F.W. 沃尔班克, A.E. 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 胡玉娟、王大庆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第575页。

过强大的海上力量维护和平安全的贸易环境,对来到这里经商的海外商人们进行征税以获得高额的利润。

政治上,殖民地与迦太基是臣属关系,它们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需要定期交纳贡赋。撒丁岛上的腓尼基殖民地和土著社区仍实行自治,由各自的市政当局管理,但可能需要对迦太基缴纳一定数量的贡赋。贡赋不只是金钱,也可能是谷物。我们发现,哈米尔卡在公元前480年向撒丁岛和利比亚征收粮食作为远征的军用物资。在北非,殖民地并不由迦太基直接统治,这些城市仍然控制着自己的领土,并保留着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但是他们必须要定期向迦太基朝贡,朝贡制度可能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甚至更早,它最初被认为是对迦太基军事保护费用的支付,尽管在公元前201年后,被罗马击败的迦太基被剥夺了拥有海军的权力,无法再保护它的朝贡国。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迦太基对利比亚人实施了十分严苛的朝贡制度,迦太基人依靠殖民地的收益满足日常生活,来自利比亚的贡品可以满足国家开支。他们的贡税在非战争状态下是谷物收获的四分之一,到了战时,贡税甚至要翻倍,^[1]殖民地城市的公民还要缴纳高昂的税费。例如,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利比亚人要上缴收获谷物的一半。在西班牙,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迦太基以行省的方式管理殖民地。按照迦太基此前在其他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来看,西班牙殖民地极有可能保留原有的制度,实行自治。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马拉加(Malaka)和阿夫季拉(Abdera)等腓尼基城市属于迦太基的正式盟友,与迦太基结盟的伊比利亚和凯尔特社区也无需交纳贡赋,而那些被迦太基以武力征服的地区则需定期交纳贡税,具体的比例不得而知。

军事上,在迦太基处于战争状态时,殖民地需要向迦太基提供军人、作战设备和弹药。大约在公元前339年之后,迦太基公民就基本不在非洲之外的战争中服兵役了,在这之后它的军队服役人员几乎全部来自迦太基控制的海外地区。在西西里岛,如果迦太基提出要求,西西里岛西部的殖民城市须为战争贡献力量和提供补给,尽管这些力量可能不是很大。每当迦太基在西西里岛发起重大军事行动时,它会首先从非洲和其他海外领土派遣部队,在公元前480年,迦太基派遣到西西里岛的远征军便

是由腓尼基人、利比亚人撒丁岛人和其他人组成。在撒丁岛,在公元前480年左右,迦太基的哈米尔卡将军指挥的希麦拉战役中,撒丁岛的战士首次以雇佣军的身份出现。^[2]之后迦太基逐渐控制了撒丁岛的大部分地区,撒丁岛人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此时撒丁岛人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来自迦太基人控制的地区,来自迦太基控制的撒丁岛地区在战时有义务提供一定数量的战士供迦太基将领驱使,岛上非迦太基控制区域的战士则以雇佣兵的身份出现,有权获得一定数量的报酬。^[3]北非的士兵是迦太基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公元前480年,哈米尔卡指挥西西里的战役时,迦太基的军队中的雇佣军首次被提及,这时的雇佣军是由撒丁岛人、利比亚人、科西嘉人、伊比利亚人、腓尼基人和利古里亚人组成,这时的利比亚人很可能是以雇佣军的身份出现在战争中。但是不久之后,当迦太基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北非时,利比亚人的身份也随之转换,此时的他们是军队中的应征士兵,且成为迦太基军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西西里战役中,利比亚的应征士兵数量达到了4000人,占到当时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他们作战形式灵活,在战场上既能作为轻装步兵快速袭击,又可以组成步兵纵队在战争中屡建奇功。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一场对抗希腊人的战争中,来自非洲同盟的骑兵在汉尼拔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班牙的情况更加复杂,加的斯、马拉加和阿夫季拉等腓尼基旧城只需提供船只和船员进行海上运输活动,战时需要提供战舰和舵手。与迦太基结盟的伊比利亚和凯尔特社区需要为迦太基提供一定数量的步兵和骑兵特遣队,那些被武力征服的地区在为迦太基提供更多的兵丁。

综上,迦太基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殖民地管理制度,由于殖民地的复杂构成,迦太基在殖民地的原住民、腓尼基旧城和武力征服地区往往推行不同的政策,一般来说殖民地的腓尼基旧城最受优待。

[1]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cis Group, 2010, p. 134.

[2] Same as above note, p. 110.

[3] [英] F.W.沃尔班克, A.E.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胡玉娟、王大庆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93-599页。

在政治机构设置上,迦太基仅将西西里岛划归为行省管理,撒丁岛等殖民地也存在市镇官员和移民点行使管理职能。在制度层面上,殖民地与迦太基是臣属关系,它的商业贸易被迦太基垄断,需要按时交纳贡赋、提供作战士兵等。

迦太基为了发展商贸,在西西里岛、撒丁岛、北非和西班牙等地区建立许多殖民地,看似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贸易帝国,但并没有对殖民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统治,它们顶多是一个松散的利益联盟,缺乏强大的政治支持和基础。为了牢牢掌控这些因利益结合的城邦,迦太基还通过多元的手段构建与殖民地间的更深刻的联系。

2. 构建“迦太基人”的身份认同感

迦太基在海外开疆拓土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建立与殖民地之间的更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铸造统一货币、宣扬美刻尔崇拜的方式建立的。通过铸造统一货币,切断殖民地与旧文化之间的联系,建造和宣示新的种族身份认同;通过宣扬主神美刻尔和托菲特制度,与其他的迦太基殖民地建城传说相关联,以主神美刻尔为根基与殖民地建立关系网,假以时日便更加牢固地掌握众多盟友和海外殖民地。

迦太基在西元前5世纪开始大规模开疆拓土,时间上恰好与迦太基在铸币上采用Phonix也就是棕榈树图像不谋而合,公元前4世纪中叶,迦太基开始铸造较小型的青铜币发行于地中海,币上再次出现棕榈树,帝国的野心昭然若揭。^[1]在广大的腓尼基统治范围内刻意使用通用等量的通用形制,这种所谓的跨区域青铜币的图像的推广对迦太基大有裨益。历史学家苏珊·弗雷·库柏指出,这样做也有思想上的目的:定量专注于小数额无规制的跨区域通用货币,同时也意味着布匿世界文化政治上的相对统一。^[2]这些钱币将Phonix放进了这个遍及迦太基势力范围的地区里,这对一个新兴帝国势力扩张来说是一个好主意,它试图吸引一大群有自己主张的集合体,野心勃勃的共谋超越帝国之都的宏图大计,铸有立马站在一棵棕榈树前的青铜币形制,自公元前300年左右便开始发行,自公元前300年西西里西部通行数量远超其他货币,就如同迦太基借用希腊技术铸造这种货币,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语言里并无既有的团体身份认同可以使用,于是他们也同时使用了希腊的一个标签,来建构出一种全新

的团体身份认同,重点在于强调他们腓尼基语族之间、腓尼基与殖民地之间的关联性,而不论他们的实际出身如何。

创造新的身份认同,强调现存的种种,或者采纳外界的资源,一直都是政治领导人用来界定和必要时激励其对象的最佳方法,而无论对方是否接受。崭露头角的新兴迦太基帝国在它的势力范围内,通过这种方式将迦太基与殖民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殖民地与旧制割裂开来,更加牢固地从思想上掌控了腓尼基盟友和广大殖民地。公元前5世纪末,迦太基最亲密的附庸西西里仿效迦太基在铸币图案上选中棕榈树的图像便不足为奇了。除了铸造统一货币外,迦太基还在其势力范围内大肆宣扬美刻尔崇拜。凭借美刻尔网络的扩展,迦太基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不带恶意地展现出它蒸蒸日上的权势,以平和的手段为在殖民地的霸权正名。迦太基与殖民地之间宗教信仰上的关联性也使得它更容易在它的统治区域内被接受,同时反过来也凭借钱币在统治区域内的推广使用强化了新建的腓尼基身份认同。

美刻尔是也迦太基母邦推罗的主神,它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查士丁晚期的记载中。^[3]现有的罗马和希腊资料一致证明,推罗和它的子民之间关系紧密,而这些殖民地与母邦推罗之间的那些联系都是以它的主神美刻尔为核心。推罗的殖民地加迪尔、迦太基、优提卡利、索斯和喀提亚的建城传说都与美刻尔有关。加迪尔、迦太基、和喀提亚的起源故事涉及了从推罗的美刻尔神庙转移了崇拜用的圣物。加迪尔和利索斯的起源故事则称美刻尔神庙被建立在了新的殖民地上,这些神话故事不仅隐藏了殖民背后的血腥和暴力,将霸权政治合理化,而且将美刻尔与殖民地的建城渊源相联系,打造出新的身份共同体,从意识形态上将殖民地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在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美刻尔崇拜积极地为推罗和一千殖民地与母城建立起了渊源,同时也促进了这些海外殖民地之间以美刻尔崇拜为根基建立关系网。美刻尔的传播范围绝不仅限

[1] Josephine Quinn, *In Search of Phoenici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16.

[2] Same as above note, p. 156.

[3] Same as above note, p. 17.

于其统治的领域内,实际上,它的范围早已超出了推罗的自封殖民地,同时其殖民地以外的其他城邦甚至在其影响下自觉接受美刻尔崇拜。

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腓尼基的宗教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且推罗允许它的子城从首府的美刻尔神庙带走圣物建立新的殖民地,如加迪尔的建城传说便涉及从推罗的美刻尔神庙转移了崇拜用的圣物,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之下,迦太基延续了母邦推罗的美刻尔崇拜,也将这种崇拜带到了迦太基的海外殖民地。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西西里发行的一系列四德拉马克的银币正面就有美刻尔的头像。希腊化时代的两个碑文也有提及,迦太基有美刻尔的庙宇或圣所。^[1]除此之外,迦太基还利用美刻尔的可转移性,与海外殖民地建立联系,将殖民地与它融合为一体。比如在萨丁尼亚,公元前2世纪希腊作家保萨尼亚斯的记载的故事中,“第一批横穿这座岛屿的人据说是利比亚人,他们的领袖是萨多斯(Sardos),他们是马克力斯的儿子”。埃及人和利比亚人将马克力斯称之为美刻尔,萨多斯的希腊名字则是Sardus Pater意为撒“丁岛之父”,是公元前4~5世纪时撒丁岛西南部供奉的神祇。这则关于萨丁尼亚的起源神话在美刻尔和殖民地之间建立了起源关系,撒丁尼亚的神是阿非力加的后裔,所以在政治上,萨丁尼亚依附着有美刻尔的阿非力加城市迦太基便更加顺理成章。^[2]

随着迦太基霸权的与日俱增,迦太基不断的宣扬美刻尔是殖民地最重要地区的神祇之父,将此作为合理化霸权的一种手段,同时将自己融入成分混杂的殖民地原住民的文化当中,美刻尔此时在殖民地的背景下扮演着一种调解而不是有区分作用的角色,有力地促进了迦太基与殖民地之间的融合,使迦太基在殖民地的统治更加牢固。

综上,迦太基通过海外扩张活动在西西里岛西部、撒丁岛、西班牙南部和北非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凭借着强大的海军力量展示、对部分地区的武力征服和经济控制等多种方式,迦太基垄断殖民地区的商业贸易、沿岸运输航线,殖民地的经济管控十分严苛。与此形成对比,迦太基对殖民地政治管控十分宽松,各殖民地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它们大多沿袭旧制。同时,殖民地需要定期向迦太基交纳贡赋,在战时为迦太基提供作战士兵和武器等。由于缺少对殖民的有效管理和统治,也没有形成统

一的政制基础,迦太基和殖民地之间实际上结成了一种松散的利益体系。为了加强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迦太基通过铸造统一货币、宣扬美刻尔崇拜等方式构建殖民地的“迦太基人”身份认同感。

四、迦太基共和政体的特征

迦太基共和政体具有鲜明的特点,其政体的稳定性、制衡性以及统治阶级的二元结构等使它区别于其他共和政体。下文首先从迦太基政体本身特点入手,然后选取典型的罗马政体和斯巴达政体与迦太基政体进行比较。通过对比,既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迦太基政制背后的成因和基础,也可以更好地厘清迦太基、斯巴达和罗马共和政体之间的区别,为共和政体的类型化提供管见。

(一) 迦太基的共和政体的实质和特点

1. 迦太基政体的实质

对迦太基政制的理解,不仅要关注迦太基的苏菲特(王制因素)、公民大会(民主制因素)和长老院与一百零四人院等(贵族制因素)政制外观,还应该注意它的政制实质,即各种政治权力、阶级及其内部的制衡。迦太基属于典型的共和政体,它的政体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有机结合,相较于那些建立在单一制基础上的政体,迦太基政体结合了这三种政体的优良特征,避免了单一政体的内在缺陷,同时多种政制因素的混合制衡使每一种政体都中和了另外一种政体的力量,它们之间不会压倒或者超过另外一种政体,使迦太基在公元前6世纪之后的数百年中长期保持稳定状态。^[3]但共和政制并非迦太基独有,克里特、希腊、斯巴达和罗马等政制中也存在着混合制或者共和制的色彩,因此仅将迦太基政制归结于共和政体并不足以说明其政制的特殊之处,还应该深挖迦太基政制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运作、它们在迦太基政制中扮演的角色,这才是把握迦太基政制实质的正确路径。

首先,苏菲特是迦太基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行

[1] Josephine Quinn, *In Search of Phoenici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85.

[2] Same as above note, p. 196.

[3] [古希腊]波利比乌斯:《通史》(上卷),杨之涵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458页。

政和司法等事务等方面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绝对性权力，代表着迦太基政制中的君主制因素。^[1]在权力实际运作过程中，苏菲特的权力行使需要元老院等机构的配合，也会受到公民大会的制约。苏菲特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城邦重大事务最终由公民大会决定，这导致苏菲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民大会的制约。与此同时，苏菲特可以召集主持民众大会，与长老院共同行使创议权和司法权等，这些权力的行使都需要公民大会和长老院的配合。以苏菲特为代表的君主制因素在迦太基政制中始终存在，并在政制实际运行中与其他因素相互制约，相互配合。

其次，长老院、五长老团、将军和一百零四人院是迦太基贵族制因素的代表，后期一百零四人院掌控了迦太基政权，本段主要以一百零四人院为例进行说明。一百零四人院主掌监察和军事审判职能，最初由五长老团每年以才德的双重标准选任，具有明显的贵族制因素。^[2]到了迦太基的发展后期成为富商和农庄主的政治大本营，监察范围由将军扩大到包括元老和苏菲特在内的全体官员，实际掌控迦太基政权。一百零四人院不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由五长老团推选，后期的任职期限变为终身制，具有典型的贵族政治色彩。在政权实际运行中，一百零四人院的监察权的行使需要迦太基官员们的配合，如公职人员们需要配合一百零四人院向其提供任期内的财产清单等。此外，一百零四人院行使监察权和审判权也往往受到公民大会的限制。

再次，迦太基的公民大会代表着其政制中的民主因素，公民大会拥有广泛的选举权，一百零四人院以外的机构的官员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苏菲特、长老院等机构。此外，公民大会享有城邦重大事务的最终决策权，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公民大会仅有表决权，创议权被长老院和苏菲特把持，公民大会只能被动地对苏菲特和长老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提案进行表决，公民大会的权力受到限制。

最后，在上述政制因素的背后，是寡头们在操纵迦太基的政制。将军、苏菲特和长老等官职不对普通公民开放，虽然选举权由公民大会行使，但迦太基贿选之风盛行，选举的胜利要以金钱为代价。迦太基官员实行无薪俸制，同时实行兼职制度，常

常会见到一人兼任数职的现象。这样的制度设计下，迦太基公民权受到限制，多数公民因为低于一定的财产标准而被剥夺了政治权力，权力掌握在长老院和行政官员等手中。^[3]城邦官员大多是有钱有空闲时间的富商或农庄主，他们长期把控着国家政权，将迦太基政制当作敛财工具。到迦太基发展后期，迦太基政权长期被少数家族掌控，汉尼拔所在的巴卡家族便是实例。

迦太基政制实际上是商业寡头主导的寡头共和制。在贵族寡头的操纵下，迦太基政制中的君主制因素、贵族制因素和民主制因素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维系着迦太基政体的运行。迦太基政制的实质不仅表现在形式上是由三种政制混合而成，更表现在制度背后三种因素的团结协作和相互配合，将各阶层纳入国家政体中。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迦太基富商阶层和大农业庄园主的特殊地位，他们受到的迦太基政制的限制十分有限。

2. 迦太基政体的特征

迦太基政体的权力配置具有制衡性。迦太基政体中包含王制（苏菲特）、贵族制（长老院、五长老团、一百零四人院和公民大会）和民主制（公民大会）因素。他们之间既互相配合，又相互制约，维系着迦太基的长久运行。苏菲特由人民选举产生，每年选出两位苏菲特共同处理城邦事务，彼此制约。将军、长老院和五长老团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掌管城邦重要事务。一百零四人院的组成人员由五长老团选任。公民大会由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的迦太基公民组成，享有选举权和城邦重大事务的最终决定权。这些机构既联系紧密，又彼此制约，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凌驾于其他机构之上的权力。

迦太基的政体以稳定著称。作为地中海西部商业帝国的迦太基政体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在存续

[1]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2] 同上注第203页。

[3] A Andrewes, *the Government of Classical Sparta, in 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 on His 75th Birthday*, Oxford, Blackwell, 1966, pp. 1-20.

的数百年时间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僭窃和严重内讧。^[1]让人疑惑的是,迦太基与罗马和斯巴达同属一类政体,政制中都包含着王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因素的混合与制衡,为何迦太基可以如此长久地保持稳定状态呢?迦太基的少数寡头占据了城邦的绝大多数利益,剩下的利益由城邦的多数平民瓜分,实际上,迦太基虽然富有,但城邦内的贫困人口数量巨大,城邦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

一方面,迦太基的强大海军往往由各大政治寡头牢牢把持以保证寡头集团的利益,但是迦太基并未组建自己的陆军。迦太基人在陆地上的战斗往往依靠来自北非、意大利等地的雇佣军,大部分的平民多少要受到寡头政制的庇护。另一方面,长期的寡头控制国家必然招致多数人的不满,迦太基精明的商人管理者们为了平息人民的不满,常用贿赂收买或者小恩小惠的方式笼络人心,他们还定期招募一批贫困的平民,将他们组成殖民队伍并输送到海外建立新的城市。被输送到海外的平民往往是破产者或者贫困者,他们去海外殖民会受到政府的表彰和嘉奖,这些奖励是十分可观的,甚至可以让一个破产者摇身一变成为富人。^[2]迦太基的定期移民政策简单粗暴地为迦太基的脱贫作出贡献,同时 will 一些存在不满情绪的潜在生事者远送海外,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避免了国家患难,维持本地区 and 国家的相对稳定。^[3]通过定期将城邦破产的公民输送到海外殖民地缓解城邦内部矛盾,这也是迦太基政制的独特之处。

迦太基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它的统治阶层是由商业寡头和大农业庄园主组成的二元结构。迦太基早期依靠海上商业活动发达,商业贸易的繁荣催生出一大批富商阶层,富商阶层逐渐掌握城邦重要权力。之后随着迦太基海外殖民地的扩张,部分富有的大商业主转向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成为大农业庄园主,与此相对应,大农业庄园主们跻身统治阶层,与富商阶层共同执掌迦太基的权力。^[4]由于两个阶层追求的利益不同,统治阶层内部产生分化,它们处理城邦事务时常存在分歧,在之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之间的分裂、对抗与合作主导着迦太基的走向。如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大农业庄园主占据上风,为了在非洲扩张土地,甚至将迦太基驻守西西里岛的部队撤回,这一决策大大削弱了迦太基的战斗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统治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化

再次体现出来,大农业庄园主为了扩张海外土地主张战争,富商阶层认为商业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战争会影响他们在地中海的贸易,因而急于结束战争,为此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罗马缔结和约。迦太基的这种政治二元结构在国家危急紧要时刻的弊端格外明显,利益的分化导致他们往往效率低下,无法达成一致决策,最终错过最佳时机。

除上述制度外,迦太基的雇佣兵制度和托菲特崇拜也十分有特色,迦太基的这些政制设计都是在其商业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立足于商业本位角度观察这些制度,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迦太基的政制。

(二) 迦太基的共和政体与斯巴达和罗马政体的比较

1. 迦太基共和政体与斯巴达政体的比较

(1) 斯巴达共和政体设计

斯巴达属于典型的共和政体。斯巴达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主要政权组织是国王、长老会议、埃伏尔和公民大会,它的整体的政权结构与迦太基十分相似。波利比乌斯对斯巴达的政体十分欣赏,他认为,莱库古制度下的斯巴达共和政体比其他几种当时人们认为最为优秀的政体更加优越。^[5]

斯巴达实行双国王制,这在古代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可能是两个平等的部落联盟合并抑或是一个部落内的两个势均力敌的政治集团相互妥协的产物,背后的目的是利用双王的相互牵制来维持斯巴达政体的平衡。双王固定地从斯巴达的攸里阿基斯(Agis)家族和优律彭(Eurpon)家族中选出,实行嫡长世袭制,这一做法一直维系到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之交,此后,斯巴达的双王变为选任世袭制,即两大家族的候选人需要得到公民大会的审查和批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8页。

[2] Dexter Hoyos, *The Carthaginians*, Talor & Frabeis Group, 2010, p. 56.

[3]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页。

[4] Josephine Quinn, *In Search of Phoenici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15.

[5] [古希腊]波利比乌斯:《通史》(上卷),杨之涵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43页。

准。斯巴达的王制实际上采取了同僚制和有限权力制，这决定了斯巴达国王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而仅仅是两名尊显的最高公职人员。斯巴达的双王掌握着最高军事权力，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们可以对任何一个国家开战而不受到其他组织的阻止。亚里士多德认为，斯巴达的双王在本邦并无绝对统治权，在率领军队在外征战时才有最高指挥权，双王的职位实际上是一个终身任职的统帅职位。^[1]但值得注意的是，双王的军事权力是有限的，他们要受到埃伏尔的限制，即使是在军队出征时，国王的队伍中也会出现两名埃伏尔对国王的军事行动进行监督，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埃伏尔甚至有权监禁双王，由此可见埃伏尔对双王起到制衡和威慑的作用。^[2]除军事权力外，斯巴达双王第二大权力是宗教权力。在非战争时期，双王履行大祭司的祭祀职责，出席所有的祭祀场合，在战时双王则在斯巴达的城邦内外举行祭祀活动。相较于双王的军事和宗教权力，双王享有的经济权力、立法和司法权力则要弱得多。在经济方面，即使斯巴达比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具有更加明显的平等色彩，但斯巴达的国王没有达到其他地区国王的富裕程度。即便如此，国王仍处于斯巴达经济的上层，就连柏拉图也称斯巴达的国王是最富有的公民。色诺芬也在他的著作中记载，斯巴达的国王拥有着与其地位相符的财产和庄园，并驯养着许多的战马和猎狗。^[3]由此可见，斯巴达的国王们一定十分富有。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斯巴达国王的权力十分有限。斯巴达的立法权实际掌握在长老院的手中，如前所述，国王也是长老院的一员，因而享有一定的立法权，但这种立法权并未超越其他长老的权力。国王对斯巴达司法事务仅享有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相较于双王而言，长老院在斯巴达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今天习见的长老院起源于荷马时代的长老会议，形成于莱库古改革之时并在之后长期存续。普鲁塔克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莱库古改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创建了元老会议。^[4]长老院享有重要司法权^[5]，且有实际上的创制权和决策权，是决定斯巴达贵族共和政体属性的机关。元老院由双王和 28 名德才兼备的 60 岁以上的男性贵族公民组成，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和良好的道德水准是长老的选拔标准。长老的产生采取

的是竞选制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竞选长老的公民往往来源于贵族阶层，他们在选举之前要进行游说，这种游说与雅典的竞选演讲有相同性质。色诺芬称，斯巴达人特地设置比赛，竞选长老的公民需要在美德方面展开竞争。^[6]长老由公民大会以呼声选举的方式在竞选人中选出，终身任职。斯巴达长老院的主要职权是司法。根据色诺芬的记载，莱库古让长老院审理重大司法案件。除司法权外，长老院和国王共享提案权，他们可以向公民大会提出新增或者废除法律的议案。在特殊情形下，长老院可以和国王一起否决公民大会的决议。长老院不仅是斯巴达的最高法庭，负责审理社会重大案件，它在斯巴达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发挥着中坚作用。对此，普鲁塔克这样评述：“这艘大船的压舱物，在防止政治极端化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使政局获得了最为安全有序地处理，因为当问题在于阻止民主政治时，28 个元老总是站在国王一边，另一方面，他们总是加强着人们反对暴君政治的侵犯。”^[7]斯巴达的政局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离不开长老院的这种均衡作用。

斯巴达的另一主要政权组织是公民大会，由 30 岁以上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会议每月在斯巴达中心地区附近的露天场所召开一次。公民大会的两个重要职权是立法权和选举权。立法权可以分为提案权、审议权和表决权。斯巴达公民大会无提案权，但是对国王和长老院未达成一致的提案享有有限的审议权，公民大会对国王和长老院提出的议案可以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

[2]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58-161页。

[3] [古希腊]色诺芬：《斯巴达政制》，陈戎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3页。

[4]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56页。

[5] [古希腊]色诺芬：《斯巴达政制》，陈戎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8-159页。

[6] 同上注第11-14页。

[7]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67页。

进行审议并表示同意或否决,若公民大会扭曲或者彻底改变了原提案,国王和长老院可以采取阻止措施。公民大会的另一重要职权是选举权,斯巴达许多诸如长老、埃伏尔等重要官员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公民大会的选举具有直接民主的成分,公民投票表决,多数者即当选。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埃伏尔出现在公元前754年左右,埃伏尔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1]埃伏尔制度使斯巴达的政治具有了明显特征。埃伏尔自古典时期起便摆脱了国王的从属地位,其职权范围十分广泛。埃伏尔可以利用宗教权力干预双王的选拔,埃伏尔并没有直接指挥战争的权力,但是有许多与战争相关的权力。但埃伏尔最重要的权力是监察权,它拥有对所有公民、官吏和国王的一切伤风败俗、违背法律和违背旧例的行为的监督权。亚里士多德说它“有权检查一切行政人员的行为”^[2]。此外,埃伏尔的另一重要权力是司法审判权,与前面的监督权相结合,埃伏尔拥有了对一切不道德或者不法行为的审判权。除了上述权力外,埃伏尔有权召集公民大会,偶尔有权提出提案,享有有限的立法权力。公元前5世纪中叶后,埃伏尔的监督权逐渐扩大并掌握了主要国家权力,并与公民大会组成政治同盟与国王和长老院组成的政治同盟相互制衡。

斯巴达的政体有一个显著特征,即三大机关共享国家最高权力,不存在绝对凌驾于其他机关之上的权力机关。国王掌握着军事权力、宗教权力、立法权力和其他特权,但是对内双王的设置使得国王之间的权力形成制衡,对外国王的权力受到埃伏尔和监察官的监督制约。长老院和国王共享提案权,可以新增或者删减法律,但是这种提案权是受到公民大会制约的,公民大会可以对二者提出的议案进行审议并作出通过或者否决的决议,这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国王和长老院合谋垄断国家权力。公民大会虽然是唯一可以否决长老院提案的组织,一定程度上享有国家事务的终审权和最终决定权,但一方面公民大会无提案权,仅能对国王和长老院提交的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另一方面不能彻底改变提案,否则会受到国王和长老院的阻止,受到长老院和国王的制约。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斯巴达三个主要政权组织相互牵制平衡,也使得斯巴达的政体得以长久地维持下去。^[3]

(2) 迦太基共和政体与斯巴达共和政体的比较分析

斯巴达的主要政体架构和迦太基存在很大相似之处,都混合着王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且主要的政权机关的权力之间相互制约,有效防止了某个组织机关专权独断,确保了政权的长久运行。但仅仅从整体着手分析不同国家政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够的,下面将从两个国家的阶级构成、经济基础等方面进行比较说明。

一方面,斯巴达拥有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军事专制制度。斯巴达城邦是多利安人征服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地区之后建立的,这一征服是外来民族对原住民殖民性的征服,被征服的原住民因此成为奴隶,他们被称为希洛人,在城邦中以奴隶的身份存在。希洛人被勒令从事生产活动,在城邦中的地位十分低下,也不得与斯巴达人通婚。斯巴达的居民总计有3万多人,而他们控制的希洛人的人口总数达22万之多。^[4]面对人口数倍于斯巴达人的希洛人,斯巴达人好像坐在了火山口上,他们面临着希洛人随时爆发反抗的危险。为了更好地掌控希洛人,斯巴达人可谓疲于奔命。为了能够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斯巴达的统治阶级一方面将所有斯巴达人变成统治阶级,加强斯巴达的内部团结以维护稳定统治,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当地的土著人民反抗,维护斯巴达人的统治地位,斯巴达形成了军事专制制度,斯巴达人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方面维持着十分强势的统治方式,政体中的寡头因素十分明显。

与此不同的是,迦太基以商业立国,迦太基人对商业的热情远远超过政治和军事战争,商人的身份使他们往往倾向于以非暴力的方式获得最大的利益。迦太基的许多殖民地是为了发展商业和攫取海外利益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迦太基人对待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往往比斯巴达人更加宽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8页。

[2] 同上注第127页。

[3]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张竹明译,商务图书馆1983年版,第544-545页。

[4] 祝宏俊:《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和，迦太基人并未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变成如希洛人一般的奴隶，相反大多城邦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并沿袭旧制，他们对迦太基承担的义务只是需要按时缴纳贡税且战时提供部分的粮草或者士兵而已。与迦太基关系亲密的城邦的公民们甚至可以被授予迦太基公民的荣誉称号，同时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可以与迦太基人通婚，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另一方面，斯巴达经济以农业为基础，迦太基则是以商业贸易为主要经济支柱，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各自的上层建筑的差异。如前所述，斯巴达的国家体制要为军事服务，经济自然也不例外，斯巴达的国家经济实际上是一台不停运转的战争机器。公元前8世纪时，斯巴达的工商业十分发达，但是自公元前5世纪莱库古改革后，斯巴达的工商业逐渐走向衰落。为了使斯巴达内部团结一致，增强凝聚力，斯巴达贵族采取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来防止内部分化。^[1]在他们看来，财富可以使城邦青年走向腐化和堕落，采取闭关政策、拒绝和其他城邦的贸易往来、限制工商业可以很好地预防这一点，在实践中斯巴达人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了贸易经济来源，斯巴达人只能依靠农业。斯巴达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斯巴达三面环山，仅南部临海，还有奥伦特河流经此处，斯巴达的平坦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决定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斯巴达将土地均分给斯巴达人，但土地仍属于国家所有，不允许私自转卖。前面提到过，斯巴达的一切制度设计都要为军事服务，斯巴达人要参与军事训练，他们靠奴役希洛人进行农业生产。但很明显，仅仅依靠奴隶的农业无法创造更多的物质，因而斯巴达的经济文化逐渐落后于其他城邦，斯巴达逐渐成为保守贵族势力的大本营。^[2]

与此相对，迦太基人天生逐利，内部并无数量庞大的奴隶虎视眈眈，他们可以为了利益常年奔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的不断增多和内陆的吸引力不断加强，一些商人逐渐分化转为大土地所有者，另一些商人则发展成为新兴工商主，迦太基的大土地所有者阶层和新兴商业阶层同属迦太基富贵阶层。而两个阶层之间的分化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主要政治组织的分化。苏菲特和元老院成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倡导者，一百零四人院和五长老团则是富有工商业者的代表。以这

两种势力为代表的政治组织不时展开政治斗争，对共和国政权机构间的关系和国内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也正是因为这种拉锯，导致了迦太基在几次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选择。

斯巴达和迦太基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使他们最后走向了不同的结局。斯巴达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经济成分更加封闭和单一，国家的一切制度都是为了军事服务。严酷的军事体制造就了斯巴达人的勇气，同时剥夺了被统治者的权利，所以最后斯巴达被希洛人推翻。迦太基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以农业和工商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作为商业国家，迦太基显然更加地开放和包容，国家的制度设计更多地围绕商业展开。商业国家的本质决定迦太基统治阶层具有天然的软弱性，他们往往习惯于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这在对外政策中表现为迦太基人常常通过合约或者协议而不是战争的方式去解决矛盾。而统治阶层内部的分化和拉锯导致迦太基在一次次重要的抉择中丧失良机，逐渐失去最初的竞争优势并走向溃败。

亚里士多德认为，斯巴达政制中混合着王制（国王）、贵族制（长老院）和民主制（埃伏尔和公民大会）元素，属于共和政体。^[3]在共和政体类型之下，斯巴达政体中民主因素倾向明显，笔者更倾向于将斯巴达政制定义为准民主制共和政体。

斯巴达的双国王实行世袭制，终身任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殊地位。政治上，斯巴达国王是长老院的成员，可以就国家重要事务进行讨论和决议；司法上，国王与埃伏尔共同行使司法权力；军事上，国王是最高军事统率；宗教上，国王享有重要宗教祭祀权力。国王拥有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特权使他们在斯巴达政制中看似拥有特殊地位。但是在实际运行中，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自公元前6世纪之后两百年里，相继产生了20位国王，除了克列奥美涅斯和亚偈西劳对斯巴达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他国王或年幼继位或只满足于军事权

[1] 祝宏俊：《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2] 同上注第83页。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8页。

力,并未发挥真正的政治影响。国王在政制中的性质或者地位完全依赖于国王个人品格,而不是国王的地位。长老院在迦太基地位显赫,通过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一定程度上掌握大会议程。但是公民大会由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重装步兵组成,斯巴达的常备军都是由公民组成,国家没有专门镇压公民反抗的机关,只要由全体士兵组成的公民大会希望行使权力,没有机关可以阻止。

反观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和埃伏尔,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公民大会并不是橡皮图章,相反它是斯巴达政制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大会定期召开,可以对城邦大小事务进行表决。此外公民大会可以选举补选长老和埃伏尔。埃伏尔是斯巴达政制中另一重要民主因素,它由公民大会选举,任何公民都可以成为埃伏尔,即使出身寒微的人也没有被拒之门外。埃伏尔对国王权力进行全面监督,还可以审判国王,斯巴达国王列奥美尼斯和托阿纳克斯等人就曾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流放或者罚款,这说明埃伏尔的监督权并非只是摆设。埃伏尔在对外政策和军事领域方面享有重要权力,他们可以在不经请示的情况下对其他国家出兵,也可以决定公元前4世纪早期的绝大多数的出兵和宣战。

综上,斯巴达的双王和元老院形式上很显赫,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国王实行同僚制,相互制约,任何一方都没有独裁权力。长老院看似控制公民大会议程,但是发挥的作用有限。埃伏尔和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制中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掌握着斯巴达政治大权。鉴于斯巴达的特殊社会架构和公民范围,斯巴达能在两百年里保持稳定,说明多数时候,公民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是满意的,更有可能在很多时候,公民本身就是决策者。斯巴达的政制由于全体公民的参与,以及普通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更多的民主制特征。斯巴达实行严格的等级划分,将居民划分为斯巴达人、边民(庇里阿西)和黑劳士,斯巴达政体是建立在少数斯巴达人奴隶多数希洛人的基础上的,所以政制不属于民主制类型,笔者认为将它定义为准民主共和政体更加贴切。

与斯巴达政制中突出的民主制因素相比,迦太基政制中带有明显的寡头特征。公民大会会有选举权和对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但是这种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常常受限。公民大会只享有决策权,而没有创议权,因而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苏菲特和长老院,

甚至苏菲特和长老院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跳过公民大会决定国家事务。^[1]迦太基的雇佣兵制度固然使公民免于服兵役,但是也导致公民大会权力受损时缺少捍卫权力的保障。国家权力更多的掌握在长老院和一百零四人院等机构手中,它们掌管国家行政、司法、立法和军事等权力,在迦太基政制中占据着主要地位。从官员的选任到履行职务,迦太基的一套选官制度设计使许多公民因为达不到特定财产标准而被剥夺政治权力,公民权受到限制,公民大会也得不到重视,迦太基政制具有明显的寡头色彩。

2. 迦太基的共和政体与罗马共和政体比较

(1) 罗马共和政体的设计

罗马的政体属于贵族共和政体。罗马的主要政权机构是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但是执政官的因素并不显见。罗马共和国的直译为“罗马元老院和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这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老院和人民的二元政治结构特色。^[2]

执政官享有广泛的行政、军事、宗教权力,是共和国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拥有最高统治权。在行政方面,执政官有权召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提交议案并执行决议。在军事方面,执政官是军队统帅,负责召集军队、任命将领和指挥战斗。在宗教方面,执政官负责主持部分宗教仪式。

元老院是由氏族部落长老会议发展而来,掌握立法、行政、外交、宗教和财政等权力。共和国的立法权原则上归属公民大会,但实际上被元老院间接控制。元老院经常对行政官员给予监督和指导。鉴于元老院的权威地位,行政官员办事时往往秉承元老院的意志。此外,元老院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掌握大部分国家财政大权、制定外交政策等。

公民大会是罗马名义上的最高政权机构。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存在四个公民大会: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库利亚大会、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部落大会、建立在部落和平民身份基础上的平民会议和以财产等级为基础的森都利亚大会。公民大会会有权选举公职人员和通过元老院的提案,此外它们还享有不同

[1]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2]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程度的立法权和审判权。

在政体设置方面，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共和政制中的民主因素（人民）、王制因素（执政官）和贵族制因素（元老院）相互制衡，是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罗马的政治实践中，执政官代表的王制因素并不显见。一方面罗马的执政官任期仅一年，而元老院的元老们终身任职，体现着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执政官对元老院的依赖，在很多事务上不得不听从元老院的意旨。另一方面，公元前4世纪通过的奥斯尼乌斯法规定，共和国的高级官吏在卸任后进入元老院，这一政策加剧了执政官们在任职期间对元老院的依赖性。严格来说，执政官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元老院，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要素。罗马共和国的直译为“罗马元老院和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这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老院和人民的二元政治结构特色，^[1]但整体上看，公民大会的主体被限制在享有公民权的成年男性，适用范围狭窄，公民大会名义上是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构，但权力的行使常常受到元老院的限制，并不真正拥有什么主导性的权力。公民大会拥有表决权而无创议权，这导致议案要由主持会议的高级官员提出，元老院通过对高级官员的控制实现对公民大会的掌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民大会的决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元老院的权力十分广泛，其权力范围遍布立法、行政、军事、财政和宗教等领域，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权力中心。^[2]罗马共和国在形式上是贵族制和民主制因素相结合的共和政体，但实际上贵族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权实际被少数贵族牢牢把控，所谓体现多数人意志的民主因素也只是一个陪衬，罗马共和国实际上是贵族共和国。

（2）迦太基共和政体与罗马共和政体的比较分析

首先，在政体的社会基础方面，罗马的贵族共和政体建立在广大的独立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基础上，迦太基的寡头共和政体则是建立在从事商贸的工商业者基础上。正像美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所评述的那样：罗马人最开始只是一群农民……军民迫于生计而变得好战。除掠夺邻居之外，他们找不到可以获得财富的其他途径。罗马人按照战争的需要组织社会，并将

胜利奉为最高价值。^[3]自罗马共和时代初始，土地便一直被罗马公民视为最宝贵的财产，与此对应，小土地所有者成为共和国的重要支柱。罗马公民的土地情节使他们异常珍惜土地，这种情节贯穿其历史的始终。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罗马人也曾战败过，但是他们从未割让出一寸土地。反观迦太基，迦太基先天具备发展农业的优势。迦太基地处非洲沿海地区，气候适宜，土壤肥沃，适合农业种植。在迦太基建立后，它的农业很快得到发展，盛产大麦和小麦等作物。从腓尼基先辈那里传来的无花果、葡萄等种植技术也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部分成功的大商人将重心由商业转至农业生产，他们使用大量奴隶进行规模化耕作，逐渐取代小农经济。迦太基农业十分发达，迦太基的将军马戈更是写出了农业著作，在其灭亡后仍被罗马和希腊引用。但即便如此，迦太基人最推崇的职业永远是商业。他们竭力避免战争和在殖民地推行殖民事业，在战争问题上，如果战争可以避免，他们会寻找一切可能的潜在的盟友，他们总是竭力妥协以规避战争的发生，直到避无可避，迦太基殖民者在海外殖民地的统治中也依然奉行这样的原则。迦太基的公民们常年在外经商分散在各处，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可以行至地中海的各个角落，他们的居留地是商馆，在迦太基人的眼中，占领殖民地的领土并从事农业生产远不如与殖民地原住民进行交易来得重要。^[4]迦太基以商业立国，其商业活动围绕着广袤的海洋展开，在许多地区建立了商业霸权。但是迦太基这个国家有自己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缺少一个广泛的农民阶层提供兵源和依靠，长期在对外战争中依靠雇佣兵，而雇佣兵在战争中缺乏爱国热情、勇敢和献身精神。所以，迦太基在和罗马进行的争霸战争中最后失败了，被

[1]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2] Brunt P A,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1.

[3] [美]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上卷），钱乘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4] [意]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页。

自己的敌人毁灭了。

其次,在政制所影响下的兵制方面,罗马和迦太基也存在很大不同。罗马一直实行公民兵制度,迦太基最初同样实行公民兵制,但是自公元前4世纪后迦太基转而实行雇佣兵制度。此后迦太基公民仅需要在非洲本土发生战争时应征参加战斗,海外战争则主要依靠来自利比亚、撒丁岛等海外殖民地的属民或者意大利等地的雇佣军,雇佣军制度大大减少了迦太基海外扩张活动导致的本土公民的人口损耗和流血牺牲。

但另一方面,迦太基不像罗马一样将战争当作日常事务的一部分,迦太基公民常年分散在各处为利益奔走,一旦战争爆发,迦太基本土既无守卫领土的公民,也没有迅速召集和动员公民的机制,只能依靠雇佣海外士兵的方式作战,战争爆发后迦太基人的战争准备也往往逊色于罗马人,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人的表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迦太基公民在军队中的角色转换极有可能与迦太基人的生存环境联系密切。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希腊人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殖民活动来势汹汹,迦太基人试图找出潜在盟友。过去的腓尼基人为了满足亚述王朝的敲诈勒索而奔赴未知的海洋。如今的迦太基人为了获取贿赂土人首领的金钱财富而驱使自己的人民再次奔向危险的海上,这也许就是迦太基公民兵制度消失的最初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迦太基的雇佣兵制度虽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迦太基公民对外战争中的流血牺牲,但相较于罗马的公民兵制度,雇佣兵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迦太基雇佣各个民族的军队的做法,确实可以有效防止雇佣兵们联合起来对付迦太基的长官,但是若他们心生怨恨或者离心离德,由于他们不属于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的语言,那么向他们传递真相或者平息他们怒火的努力,将会适得其反,迦太基与罗马争夺西西里岛战败后,雇佣军的反叛便是其中的典型例证。从这一方面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罗马的政治体制优于迦太基,迦太基人依靠海外雇佣军的英勇来维持自己的自由,但罗马是依靠自身的英勇和其他民族的协助来维持自己的自由。也因此,即使罗马人一开始便遭受了最惨重的战败,但他们依然可以通过最后的胜利扭转战局,而迦太基人却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罗马人是为了身后的自己的国家和儿女作战,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战争中,

直到他们最终战胜敌人。

最后,迦太基的共和政体的变化的灵活性不如罗马共和政体。在探究罗马对外扩张和对外战争中成功的原因时,学者们往往将罗马成功的原因归因于其共和政体的优良,而往往忽视了其政体的灵活性。罗马实行共和制,但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执政官经元老院提名临时成为独裁官,独裁官手中的权力超越并且凌驾于一切之上,这一切包括行政、军事、立法、司法、文教等一切大权。独裁制在罗马的危急时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带领着罗马平稳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反观迦太基并没有与之类似的机构,且它的政体往往带领迦太基在一次又一次的重要时刻误入歧途。迦太基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其政权结构,大农庄经济和中介贸易决定了迦太基政权主要掌握在大农庄主和商业奴隶主手中,大农庄主的眼光主要集中在非洲本土,主张维护迦太基在非洲的既得利益,商业奴隶主则代表着商业集团,将目光投向海外,主张攫取海外利益。这两个阶级由于追求的利益的差异导致二者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是布匿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商业奴隶主和贵族之间的倾轧影响了数次布匿战争的走势。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大农庄主们占据上风,比起海外征服,他们对非洲的土地更加感兴趣。因而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农业贵族忙于扩张非洲的领土,在战争期间抽调回驻守西西里岛的部分守军,之后并未及时补给西西里岛守军,导致西西里岛的迦太基士兵战斗力大大下降,这也是第一次布匿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商业奴隶主掌权,他们认为长久的战争势必会影响到迦太基与地中海其他国家的商业贸易,因而商业贵族们急于结束战争并命令哈米尔卡在现有的有利条件下与罗马缔结条约。迦太基的内部政治斗争使它在关键时刻难以保持足够凝聚力,正如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所说:“在迦太基得势的有两派,一派总是希望和平,另一派总是希望战争,结果迦太基把自己弄得既不能享有和平,也不能很好地进行战争。”^[1]迦太基的毁

[1] [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图书馆1962年版,第374页。

灭或许肇因如此。

综上，迦太基政体和罗马政体同属共和政体，尽管二者在对公民兵的依赖程度、社会基础和政体价值理念等细节方面有很大区别，但整体的政体结构与罗马和斯巴达十分相似。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成长期、全盛期和衰败期，迦太基的势力发展和繁荣早于罗马，在汉尼拔战争开始期间，迦太基人的政体就已经在走向衰败堕落，而罗马的政体此时正在步入全盛期。此时的迦太基民众已经逐渐成为主导性权力，由民众进行决策，而罗马的元老院仍然是保留着由最杰出之人进行决策的权力。因此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上，罗马自然会更加优越，以至于尽管他们遭遇了毁灭性的灾难，但是通过明智决策，他们最终在战场上战胜了迦太基人。

迦太基政体和罗马政体在共和政体类型之下，它们存在更加细致的划分。迦太基政体属于寡头共和制政体，罗马政体属于贵族共和制政体。罗马的三大主要政制机构是元老院、执政官和公民大会，它们在形式上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维持着政制的相对平衡。但是在实际运作中，高级行政长官任期远远短于长老院的长老，他们行使权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元老院，高级长官卸任之后可以入选元老院，这些加剧了行政长官对元老院的依赖；公民大会没有创议权，仅能就反映元老院意旨的高级长官提出的议案进行投票，罗马元老院是国家权力中心。而在当时，元老多出自新贵，元老院由少数显贵家族组成，国家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罗马共和政制中，贵族制元素占据主导地位，罗马共和国是贵族共和国。迦太基政制中的寡头制倾向更加明显，迦太基政制虽然形式上同样混合着民主制、王制和贵族制元素，但从最具民主因素的公民大会到苏菲特和其他官员的选举都需要达到一定的财产要求，成功当选要以金钱为代价，需要花费大量金钱贿选，官员任职无薪俸还要身兼数职，迦太基从选举官员到任职制度的设计，造成迦太基的官职实际上被富豪垄断，民众缺少民主权力和参政热情，导致富豪和农庄主们操控国家政制，迦太基政权长期被马戈等家族控制。迦太基充斥着寡头政治，属于寡头共和政体的类型。安德鲁斯曾总结了寡头制的特点，在寡头制下，许多公民因为达不到特定财产标准而被剥夺政治权力，城邦事务主要

由行政官员和长老院等决定，公民权受到限制，公民大会也得不到重视。^[1] 迦太基的政制便是很好的证明。

五、结论

尽管迦太基的政权组织结构还存在模糊之处，但是结合现存的材料来看，迦太基政体中包含着以苏菲特为代表的王制因素，以长老院、五长老团、一百零四人院和将军为代表的贵族制因素，以公民大会为代表的民主制因素，属于共和政体的范畴。迦太基的政制设计中很好地平衡了财富、才德和平民这三种因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作为共和政体的迦太基政制中，寡头制因素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即迦太基的政治明显偏向寡头制，所以造成迦太基实际上是寡头制的性质。迦太基的形式上属于共和制的范畴，但是实际上是寡头制属性，因而将迦太基的政制定义为寡头共和制。

从迦太基内部政制的设计和运行上看，一百零四人院早期是为了防止将军权力膨胀而设置的，它的成员由五长老院每年选任，最初行使监察职能。但是在后期一百零四人院逐渐被寡头操控，其监察范围不断扩大，监察对象由将军扩展到包括苏菲特、长老院在内的全体官员，任期由一年变为长期或者终身制，实际掌控了国家政体。在此影响之下，贵族制因素逐渐被削弱。公民大会名义上掌握着国家重要事务的最终决策权，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公民大会的权力往往受到各方限制，它在迦太基的政治中的影响十分有限。在迦太基发展后期，它的政制背后往往隐藏着金钱的影子，寡头控制着迦太基的政制。即使寡头内部存在工商业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分化与斗争，但是这没有改变迦太基寡头统治的性质。

从迦太基对外政制设计和运行上看，迦太基的海外扩张活动意在发展商贸和保护贸易网络而不是占领土地，它的海外殖民地相当于海外贸易站而不是海外领地。因而迦太基在殖民地实行经济垄断，

[1] A Andrewes, *The Government of Classical Sparta, in 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 on His 75th Birthday*, Oxford, Blackwell, 1966, pp. 1-20.

在政治上却十分宽松,迦太基没有在海外殖民地构建起一套统一的制度和政治模式,殖民地大多沿袭旧制,迦太基和殖民地之间建立起一种松散的利益联盟,缺乏强大的政治基础。为了加强与海外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迦太基在殖民地推行以美刻尔为代表的宗教崇拜、铸造推行统一货币,以构建“迦太基人”身份认同感,这些举措为迦太基在殖民地的霸权提供了合理解释,加快了迦太基人融入殖民地的进程。

迦太基政体设计上处处体现了制衡思想,政体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与同属共和政体的罗马和斯巴达政体相比,它们在政体社会基础、军事制度和政体灵活性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各有优劣。迦太基政体中的寡头因素明显,城邦政策常常由大地主和大商人阶层主导,由于利益的不一致,导致他们在城邦大事上经常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长久来看并不利于城邦的长久发展。与罗马发生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和第二次布匿战争便是在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拉锯中错失胜利的机会,此后的迦太基因此逐渐走向衰败,直到最后被罗马灭亡。斯巴达的政制设计目的在于团结斯巴达居民,防止来自内部的分化,因而他们排斥甚至鄙视金钱,斯巴达人的生活是节制而简朴的。这种制度设计在维护本城邦的领土和自由方面显然足够优秀,但当斯巴达试图征服其他国家时,它显然不足以支撑斯巴达需要的资源供应,此时斯巴达政体的弊端便暴露无遗。根据莱库古的立法,他们无法获得任何有影响的地位,更不用提对希腊的霸权。

罗马的共和政体经历了贵族专权向贵族与平民分享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经历平民与贵族的长期斗争实现的。它的独创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关于政治思想的抽象创造,也不只是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创作成果,而是在长期历史中,大量的人提出、创造和经历过的政体。这种几代人反复实践得来的政体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灵活性,在这样的政体领导下,罗马走向了辉煌。

尽管迦太基城已经消失了数千年之久,但是迦太基的辉煌文明成果早已融入地中海文明甚至世界文明中,研究和还原迦太基政制本身便具有重要意义。共和制与共和思想罗马独有,也不意味着古代的民主和共和仅仅限于古希腊罗马地区,许多国家都留存了民主和共和的历史痕迹。迦太基作为与罗马基本同时期的古代共和政体,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重视,研究迦太基共和政体,一方面,可以丰富对共和政体的认识,为今天的民主政治提供更好的参照系,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更加清晰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对迦太基政体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古代共和政体并非单一政体同种类型,共和政体之下存在更加细致的划分。各种共和政体中民主制、王制和贵族制的力量对比存在差异,政体的性质需要观察各阶层和各政体内部构成元素力量对比及其在政体实际运行中的作用具体判断。如罗马的贵族共和政体、迦太基的寡头共和政体和斯巴达的准民主政体等,即使同属于一种政体框架,也各有特色。